

近代日本古典籍複製領域中的 出版商與印刷技術：以七條愷家族為中心

瞿艷丹 *

摘 要

本文以東京七條愷家族的印刷出版事業為中心，重點探討從明治年間到二戰結束前後，古籍複製領域的印刷技術演進。梳理不同時期、不同類型出版物常用的複製技術，並關注不同世代的學者與出版商在技術選擇與複製對象上的差異。

1923 年關東大地震發生後，日本各界認識到保存古籍文物的緊迫性。與此同時，中日兩國文獻學、圖書館學日臻成熟，對如何複製古籍、保存文獻提出更高要求，不僅在視覺上追求圖版的高清細膩，也盡量保全如批註、用紙、裝幀等文本之外的一切信息。學者們還競相為所選典籍撰寫具有學術價值的解題，出版商的複製書目亦直接反映出相關學者的研究動態及學術關懷。此種風氣之下，珂羅版影印原書、附加解題冊的複製模式被逐漸確立，並為中日兩國學界與收藏界普遍接受。

關鍵詞：照相金屬版、珂羅版、羅振玉、古籍、複製

* 日本近畿大學國際學部東亞專攻兼任講師

一、引言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石印、金屬活字、照相金屬版、珂羅版等各種印刷技術傳入東亞，對東亞世界傳統書籍的樣式、出版方式乃至讀者的閱讀習慣等均產生重大影響。新技術的發展使得珍貴典籍、書畫的複製變得更為容易，由此掀起了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前半期中日兩國古籍、美術品出版複製的風潮，這些出版物甚至被認為是凝聚國族認同的管道之一。

¹

當代書法家王壯弘（1931-）《崇善樓筆記》中「影印字帖」一節論及清末以來中日兩國影印字帖的風氣，羅列諸家出版商名號甚詳：

光緒廿八年，南京狀元閣有木刻印本字帖，成親王之《歸去來辭》等出版。繼之，宣統三年點石齋有石印《華山碑》。上海有正書局，請日人製版石印帖發行。嗣後有正書局狄平子請日人小林首製玻璃版印行。以日音譯為「珂羅」版，即照相版，即日人所謂寫真版是也。未幾，神州國光社請德人製玻璃版，譯為「亞土」版。後陸續出現印帖的機構有：古物同欣社、延光社、故宮博物院、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明書局、藝苑真賞社、廣倉學社、金佳石好樓、西泠印社、大眾書局、碧梧山莊、求古齋、掃葉山房、尚古山房、福祿壽、墨林、愛儷園。私人印帖較精者先後有：陶蘭泉、劉鐵雲、徐世昌、羅振玉、張伯英、容庚、徐小圃等。日本內藤虎之博文堂、中村不折之孔固亭、辻本史邑之駸駸堂、下中彌三郎之平凡社、藤原楚水之三省堂、七條愷之西東書房、廣瀨保吉之清雅堂、石川寅吉之興文社、原田謹次郎之大塚巧藝社等。私人印帖者有日下部鳴鶴、犬養木堂、長尾甲、比田井天來等。²

但其中不少細節需要訂正，如神州國光社所聘請的海外技師應為日人，似非德人。³著力影印字帖的博文堂並不屬於內藤湖南（1866-1934），而是原田莊左衛門（1855-1938）和他的次子油谷達（1886-1969）所有，內藤湖南與博文堂多有合作；原田莊左衛門是舊忍藩藩

¹ 劉宇珍：〈照相複製年代裡的中國美術：《神州國光集》的複製態度與文化表述〉，《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35 期（2013），頁 187-188。

² 王壯弘：《崇善樓筆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頁 258。

³ 神州國光集廣告中稱「用日本最新電氣銅版玻璃版法」，見〈凡例〉，《神州國光集》（上海：國學保存社，1908）第一集。

士原田家的長子，原田家次子小川一真（1860-1929）是明治年間日本著名的攝影師，三子小林忠治郎（1869-1951）是京都著名的珂羅版印刷技師。⁴孔固亭是書法家、收藏家中村不折（1866-1943）之號，中村曾以孔固亭名義出版碑帖，但孔固亭並非出版社，故應歸入「私人印帖者」範疇。平凡社、三省堂為綜合出版社，並非專印碑帖。大塚巧藝社是攝影師大塚稔（1888-1951）創立，主要複製美術品。原田謹次郎（1882-？）是美術研究者，曾在大塚巧藝社出版過《支那名畫寶鑒》《日本現在支那名畫目錄》等著述，並非巧藝社工作人員。⁵

這些錯置的信息，恰恰反映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出版規範尚未統一的實況：版權頁上所標示的編輯者、出版商、印刷商等信息常常錯綜混雜，讀者難以辨識實際的出版責任人。此一時期，出版與印刷的職能尚未完全分離，不少出版商同時擁有自設的印刷工房；而部分印刷商則多為技師出身，習藝後獨立開業。當然，比起出版商、印刷商和印刷技師，一般讀者本就更關心出版物內容及著者。

近年，學界益發關注書籍出版流通環節中出版商、印刷商、印刷技師所起到的作用，重視他們與學者的互動交流，已有一定的研究積蓄。如油谷博文堂主人油谷達、珂羅版技師小林忠治郎因與內藤湖南、羅振玉（1866-1940）、董康（1867-1948）等中日學者往來密切，為他們承印、出版過諸多資料，故而受到關注尤多。⁶應當注意的是，上文提及的諸家出版商、印刷商、印刷技師、出版愛好者等，多數並非僅關注單一領域的典籍複製出版或單一的印刷技術。如原田莊左衛門時代的博文堂早期以木版印刷出版過暢銷政治小說《東洋之佳人》（東海散士著，1888年），也以金屬活字法排印出版過諸如《獨尊子》（天眼子著，1888年）、《條約改正論》（島田三郎著，1889年）等社科讀物；到其子油谷達時代，經營重點則偏向珂羅版印刷，複製過許多書畫典籍。本文的問題關心是：面對木版印刷等傳統技術和近代湧現的種種新技術，這些印刷、出版領域的商人、技師、學者們有怎樣的取捨好惡？

早有研究指出，晚清民國時期，中國的古籍複製愛好者對珂羅版的接受度普遍不高，通常認為太費錢。⁷繆荃孫甚至曾直言「不知珂羅版之好處」，認為在京都專請小林忠治郎以珂羅版複製古籍的董康只是「上日本人當而已」。⁸而石印術在日本典籍複製領域也遠不

⁴ 研谷紀夫：〈明治後期における博文堂の写真出版事業：写真師小川一真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映像學會《映像學》第108號（2022），頁79-81。

⁵ 神田喜一郎〈序〉，原田尾山《中國畫學書解題》（京都：臨川書店，1975），卷首。

⁶ 菅野智明：〈博文堂における中国法書の影印出版について〉，《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16號（2015年3月），頁14-52。楊月英：〈董康與日本珂羅版技術專家小林忠治郎的交遊——兼補董康珂羅版印本書目〉，《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6輯（2022年12月），頁349-363。

⁷ 瞿艷丹：〈影印存真：中國近代的珂羅版印刷技術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頁152-159。

⁸ 繆荃孫：《繆荃孫全集·詩文》第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頁483。

如中國流行，因日本典籍複製品消費市場較之中國規模不大，廉價的石印本不如精緻的珂羅版更易獲利；反之，薄利多銷的石印本在中國市場更受歡迎，製作成本頗高、售價高昂的珂羅版只受到小部分藏家的青睞。同一種印刷術在不同國家、領域、時代受到的不同評價，意味著不同群體的人們對不同類型的圖像、複製品往往有著不同的要求與偏好。出版商要在這樣的情況下順利生存，需對何種印刷術適於何種出版物有清晰的認識。

截至 1940 年代末，中日兩國都活躍著不少私人出版商兼印刷商。1950 年代初開始，中國的私營出版業開始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到 1956 年春，中國所有私營出版業、印刷業和發行業，都實行了全行業的公私合營，中國的印刷、出版及發行事業，全部納入了國家計劃。⁹而日本則有一些保留店號至今的私人出版商，上述引文中提及的「七條愷之西東書房」就是一例。西東書房主人七條愷是印刷技師出身，精通照相金屬版印刷，他經營的西東書房出版過許多書籍，後來也出版珂羅版複製資料。1950 年代後，西東書房不再有印刷工房，僅保留出版業務。本文將透過這個尚未被學界過多關注的例子，考察過去百餘年間的典籍複製領域中，出版從業者與典籍複製愛好者對新技術有怎樣的吸收、選擇與運用；藉此亦可考察中日兩國出版領域的商人、技師及典籍複製愛好群體對不同印刷技術的取捨好惡。

進入正題之前，首先簡要介紹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葉古籍複製領域主要使用的印刷技術的概念及特點。

（一）石印術（Lithography）

發明於十八世紀末的德國，約自十九世紀中葉由傳教士傳入中國，在十九世紀末的上海風行一時，引發了中國的印刷革命。石印術是一種平板印刷技術，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製版石材為一種石灰石，又名石版石。先將石版石表面磨光，再用一種含有脂肪皂質的堑筆將圖案描繪在石面上，塗上一層阿拉伯膠液，最後用水拭淨。上油墨時利用捲筒，堑筆寫在石版上時，同時吸取油墨，但石面覆水的部分不吸收油墨。印刷時將紙鋪在石面上，經過印刷機軋壓，石版上塗有油墨的部分便轉印到紙面上。早期石印術是在一種含有油墨的紙上抄寫文字，然後將文字面朝下，沾水刷之，利用特製化學墨將文稿轉移到印石上，再覆紙印刷。1859 年照相石印術發明後，技術大為改進。其法是利用照相技術將文稿攝製成陰文濕片，將其落樣於塗有感光膠的膠紙上，再轉移到印石上，覆紙印刷。¹⁰照相製版可使複製本與原本不爽毫釐，且一次製版、可大量印刷，這些都是傳統雕版印刷難以企及

⁹ 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 486-490。

¹⁰ 晚清民國以來，介紹石印術的文字資料甚多，今人專著可參考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頁 156-159。為更好地理解石印術的操作過程，可參考以下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wKoYq0vL0>。（最後訪問日期：2025 年 6 月 20 日）

的優勢。來自上海的廉價石印拓本、書籍曾大量進口日本，為一般讀者所喜愛。不過石印本不易表現圖像精細的細節，油墨在紙上會留下油跡，因此古籍複製領域的石印本通常被視為方便廉價的版本。

（二）照相金屬版（Photo-meta lithography）

有照相銅版、照相亞鉛版、照相鋅版等多種類型，又有稱網目銅版者，是一種凸版印刷術，不同時期技術有所差異，原理則大同小異。首先在玻璃版上塗抹感光明膠，將之裝入片匣。再將兩片刻有不透明對角平行線的玻璃片膠合，使彼此平行線互相垂直而成一網。每英寸內所畫線數，決定網版之粗細，故稱「網目」。網版裝在照相器背後，貼近感光明膠玻璃片之前，使二者絕對平行。鏡頭開時，光線在照相機中先經過網眼，後到達感光玻璃片，因此所攝之像裂成細點。將照過的感光片在暗室中顯影定像，製成負片（底片）。在負片上塗膠，揭起膜片，再將膜片放在玻璃片上，原負片膜需翻轉，使圖文不反讀。在金屬片上澆勻感光化學溶液，在暗室內烘乾。將負片玻璃版放在曬框內，放銅片的感光面貼著負片，之後曝光。將金屬版移入暗室，在流水下沖洗。網眼間的塗料、即不被光照的部分被水溶解。將金屬版燒熱再冷卻，使塗料硬化。再將金屬版放入腐蝕液，使沒有膠之遮掩部分的金屬部分融化，如此製版完成。¹¹照相金屬版可實現大量印刷，不似一般石印本有漫漶的油跡，但在還原圖像濃淡細節方面則不如珂羅版。

（三）珂羅版（Collotype）

亦是一種平板印刷術，又稱玻璃版，19 世紀中期發明於法國，19 世紀末傳入日本和中國。據說傳教士在 19 世紀中後期已將珂羅版技術帶到了中國，但中國書畫、古籍複製領域的珂羅版技術最早是 20 世紀初自日本引進。其方法利用了感光性明膠遇水膨脹、曝光後硬化的兩重性質。具體而言，首先在玻璃版片上塗抹一層感光性明膠；乾燥後，將資料照片的底片貼合於玻璃版片內側，以紫外線照射曝光。之後沾水於明膠層，經曝光而硬化的部分不會膨脹，未曝光的部分遇水膨脹，即圖像根據曝光量顯影於明膠層上，呈顯出細膩凹凸的細節。再於明膠層上塗油墨，曝光部分硬化皺縮，不沾水，可吸墨；曝光越多，硬化程度越高，沾墨越多；未曝光部分明膠吸水膨脹，且水油相斥，無法沾墨。在其上覆紙印刷，可呈現出圖像豐富的細節，因而廣泛運用於古籍、書法、美術類文化遺產保存領域。製作精良的珂羅版複製品以其高度「存真」的特質，至今受到收藏家喜愛。珂羅版的缺點在於成本高昂，對技師工藝水平要求甚高；且明膠不耐印刷，製版一次，至多刷印 300

¹¹ 製版部：〈照相銅版製法圖說〉，《科學畫報》第 1 卷第 24 期（1934），頁 930-932。

部。¹² 20 世紀初期，京都珂羅版技術者小林忠治郎在內藤湖南、董康、羅振玉等學者的要求下，將珂羅版技術運用於古籍複製，深受中日兩國古籍愛好者推崇。¹³

二、七條愷與西東書房

（一）草創時期

七條愷是印刷技師出身，生於幕末明初的新舊交替年代，有關他的生平資料並不多見，『日本出版大觀』有一則介紹：

萬延元年（1860）12 月 17 日生，居住於神田區花房町五號。

四國高松人，肄業於高松中學，後到東京闖蕩，就讀於明治法律學校。曾短暫從事政治運動，日清戰爭後即投身實業界。當時，人們對文學熱情高漲，很多人有志研究原典，但進口圖書價格高昂，不易入手。早稻田大學教授牧野謙次郎等人試圖複製原書出版，計劃金屬版印刷，但失敗。七條愷承接其後，設立金屬版印刷會社，名曰「真金屬版」，以「ソームロース」法複寫出版原書約五十餘種，實現廉價供給，甚至被世人尊稱為恩人。蓋此時實為當時的印刷出版界帶來一大劃時代的變革。

明治三十六年（1903），我國條約改正，加入萬國出版聯盟，因此複製原書之事告停止。四十四年（1911），創立西東書房，複製古書，努力傳播書道，組織讀書會，發行雜誌《書苑》。大正十二年興起古典保存會，益發專門傾倒於這項事業。¹⁴

牧野謙次郎（1863-1937）是香川縣高松人，曾任早稻田大學高等師範部長兼文學部教授。七條愷出身應較普通，在東京時，或許曾受到這位社會地位頗高的同鄉的幫助。一則資料顯示（附圖 1），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創立於明治三十年（1897）6 月，營業目的是「金屬製版印刷」，資本金為一萬日元。業務負責人是七條愷，出資人共六名，牧野謙次郎也在

¹² 前引瞿艷丹：〈影印存真：中國近代的珂羅版印刷技術考〉。

¹³ 佐藤進：〈珂羅版之路的開拓者小林忠治郎——以羅振玉、董康、傅增湘的交流為中心〉，王勇主編：《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年），頁 18-43。為更好地理解石印術的操作過程，可參考歷史逾百年、至今仍承擔文物複製工作的日本京都珂羅版印刷商老店便利堂拍攝的解說視頻：<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fMMSaCsRg&t=107s>。（最後訪問日期：2025 年 6 月 20 日）

¹⁴ 出版タイムス社編：《日本出版大觀》（東京、大阪：出版タイムス社），頁 30-31。引文為筆者自譯。

其中，出資 300 日元。¹⁵所謂「真金屬版」，應為「寫真金屬版」（即照相金屬版）之訛。所謂「ソームロース」法究竟為何？且看另一則資料：

……他是明治三十年（1897），日本首度成功實現亞鉛版寫真應用複製版的出版界功臣。十七歲離開香川縣的鄉下老家到東京，「因為沒有錢，只能放棄學習的志願，輾轉東京市內各處見習印刷業。明治二十八年（1895）在秋葉原車站前開了小小的印刷店。……他複製了貧窮學徒無論怎樣燃起向學之心都無力購買的高昂原版書，研究應用攝影技術，經歷了反復的失敗，終於達成了目的。當時在慶應義塾大學的校長林毅六氏的要求下，複製了一千部佐姆（Rudolph Sohm）的《羅馬法》（八百頁），頒布各個大學。以此為始，明治四十四年（1911），以保存古代著書為前提，刊行雜誌《書苑》，為國文學界貢獻甚大。¹⁶

可知所謂的「ソームロース」中「ス」為「マ」之誤，即「佐姆所著《羅馬法》」之誤植。明治三十二年（1899）十二月，七條愷提交給警視廳申請檢印的五十八部外文書中，第一部就是 Rudolf Sohm 的 *The Institutes of Roman Law*（附圖 2）。不過此書應該是 520 頁，全書由 1892 年英譯本複製而來，保留原書封面、版權頁等，只在書末添加新的版權頁，「發賣所」為「林平次郎」，「印刷所」為「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印刷者兼發行」為「七條愷」，「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發行/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複寫印刷」（附圖 3）。可知七條愷是印刷商兼出版商。

所謂「加入萬國出版聯盟」，即明治三十二年（1899）七月，日本加入〈萬國著作權保護同盟條約〉¹⁷，即〈伯爾尼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公約〉（The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公約規定，對於起源於一個締約國的作品，其他每一個締約國都必須給予與該締約國給予其本國國民作品同樣的保護。那麼，日本的出版商原則上就不能再擅自複製外國著作出版販賣。但事實上，在 1900 年代初期，七條愷至少以西東書房的名義翻印出版過兩冊德語詞典。¹⁸這說明，明治年間日本的著作權管理還

¹⁵ 東京興信所編：《銀行會社要錄 附役員錄》第二版，1898 年，頁 465。另外五位出資人是田中宗兵衛（3580 日元），中井菊次郎（3120 日元），七條愷（2000 日元），鈴木元（700 日元），鈴木讓（300 日元）。按，1897 年日本公務員初入職工資為 50 日元，最近這個數字約為 187623 日元。以此為基準略加估算，1897 年的 300 日元，約為現在的 112 萬多日元。

¹⁶ 〈上野の山に老志士 損しても構わぬと 書籍報國に幾星霜〉，《讀賣新聞》1936 年 5 月 8 日夕刊。引文為筆者自譯。

¹⁷ 水野鍊太郎：〈歐洲ニ於ケル著作權法ノ沿革及其國際的關係ノ由來〉《法律學經濟學內外論叢》第一卷第五號（東京：實文館，1902），頁 1-24。

¹⁸ 如《ウェーニヒ獨逸辭書》（東京：西東書房，1903 年）、*Fremdwörterbuch* (Tokyo: Seitō Shobō), 1904。前者有多家日本出版社翻印，西東書房的廣告稱，原版 1821 年初版，之後多經改版，後傳入日本，原書市價甚昂，故而坊間多見翻刻本，「此回弊店等相謀，以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之新式寫真金屬版複製、發售本書，其印刷之鮮明不必多說，紙質精撰，製本堅固，其內容、外形皆與原書相伯仲，而其

較為鬆散。

據出版物版權頁信息可知，西東書房在 1890 年代末已開始出版書籍。而西東書房主頁稱創業於明治 26 年（1893），其名取自「西洋」「東洋」，標榜東西洋圖書都在出版範圍之內。與別家常用活字排印出版西文書不同，七條愷選擇以寫真金屬製版複製西文書。後來被美國某出版社抗議，此後才轉向書法類書籍。¹⁹

由附表 1 可知，1890 年代末至 1900 年代，七條愷出版的書籍有古典資料複製本，也有活字排印的專著，暫時看不出明確的出版方向。1907 年，他以金屬活字排印法出版了宮本基所著《國勢調查要談》，卷末附〈明治四十年（1907）五月改正 西東書房出版圖書目錄〉，有 33 種複製的西文書，2 種紀念圖冊，1 種江戶後期配圖地方志（《都名所圖會》）複製本，14 種書法碑帖。書法碑帖均標明「七條式寫真金屬版刷」，以示技術之特別。明治以來，雖有不少標榜「寫真金屬版」的印刷商，但在該詞之前冠以姓氏的似乎只有七條愷，也說明他獨具經營頭腦。所謂「寫真金屬版」，即晚清民國出版資料里常見的「照相金屬版」「照相銅版」「照相鋅版」「網目銅版」等。除了西東書房自刊圖書之外，七條愷亦作為印刷者，受託為個人或機構承印各類印刷品。例如 1927 年，大槻茂雄發行、大槻如電編《新撰洋學年表》即由七條愷負責印刷。如電自述，通常出版係採活字印刷，但活字版至少需經三校，老眼不堪其勞，遂以大字抄寫文稿，再以照相版縮小上版，委託七條愷以金屬版印行。²⁰此例亦反映出消費者對活字印刷、寫真金屬版等技術特性的清晰認識與有意識的選擇。

（二）1910 年代之後

1910 年代開始，大概當時無授權翻印西文字典的做法已不再行得通，明顯可見七條愷的出版重心集中於碑帖等書法資料。其中 1909 至 1911 年出版的高田忠周（1861-1946）著六卷本《漢字詳解》值得關注。高田忠周是內閣印刷局漢字主任，自小學習書法，成年後潛心研究《說文》，有志繼承江戶後期考證學者松崎謙堂（1771-1844）、狩谷棧齋（1775-1835）的學統。1902 年出版《古籀篇》，吳汝綸（1840-1903）作序，稱其「皆精擘創獲，未嘗前有」。²¹而《古籀篇》也由七條愷和他的「金屬版合資會社」（版權頁其下鈐朱文印「精擘」，附圖 4）承印。高田與七條愷合作多次，1929 年西東書房曾為其出版演講集《漢字の起原と支那古代の文化》。

和很多生於幕末明初的人一樣，七條愷有一定的漢學修養，初到東京時，據說曾從儒

售價太廉」。（《朝日新聞》東京朝刊，1903 年 3 月 20 日廣告）

¹⁹ 請參西東書房主頁說明：<https://seitoshobo.jp/gotaijirui>。（最後訪問日期：2025 年 6 月 20 日）

²⁰ 大槻如電：〈例言〉，大槻如電編：《新撰洋學年表》（東京：大槻茂雄發行，1927），卷首頁。

²¹ 吳汝綸：〈序〉，高田忠周編：《古籀篇》（蘆野楠山發行，1902），卷首頁。

者蒲生重章（1833-1901）和服部友德習漢學，自號聽鶯莊主人，雅好書畫鑒賞。²²這種漢學趣味想必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交友圈與出版事業。1911年，七條愷與高田忠周、後藤朝太郎（1881-1945）、油谷達、田中親美（1875-1975）等人結成法書會，發行雜誌《書苑》，「轉印和漢明賢妙蹟，各體萬殊，不敢守株」。²³其緣起為「美術之盛衰可測國光之消長，心畫之巧拙可卜人品之高下。我帝國官私寶庫襲藏法書名蹟實多，鬼神呵護，能不及水火劫厄，洵為邦國清福」，目的是「向世界誇示帝國文明之光彩」，「發揚帝國文明之光輝」。²⁴雜誌中的書法圖片由七條愷的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印刷，文字部分由日本著名印刷公司凸版印刷株式會社排印。雜誌卷末刊載油谷博文堂和西東書房的廣告，前者標榜的是珂羅版，後者則標榜金屬版。《書苑》每月發行一期，搜羅日本諸家所藏書法，以寫真金屬版複製，並刊登高田忠周、田中義成、樋口銅牛、後藤朝太郎等人文章。對西東書房而言，向出版書法相關資料的轉型意義重大，甚至可以說是西東書房能跨越百年、立足於今日的根基性事業。不過，七條愷的印刷事業一直保持著多樣化，他與中國學者文人的往來也值得關注，這在下一章中將重點介紹。

三、七條愷與中國文人學者之往來

（一）漢籍樣式的寫真金屬版

透過法書會的活動與會誌《書苑》的刊行，七條愷在東京積累了來自政府機構、書法界與學界的廣泛人脈，其中亦包括赴日東游的中國文人學者。1909年，羅振玉東游期間，曾至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拜訪七條愷，「觀其刷印樣本精絕。七條君屬予作字，頃刻已印成，並留餐，贈印譜一冊」。²⁵說起來比他辛亥後客居京都時結識小林忠治郎更早數年。

1908年，田吳炤（1870-1926）任留日學生監督並清國使署參贊，協助羅振玉在日訪書。翌年夏，羅振玉以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身份，奉學部之命赴日視察農科大學。期間與田吳炤流覽書肆，然未得古籍善本。羅歸國後不久，田吳炤忽致書云，已獲得精寫本《廣唐賢三昧集》，並寄影印本數紙。此書原藏常熟翁同龢處，後流傳至朝鮮，復由日本書肆舶載歸，最終為田氏所得。²⁶

²² 玉林晴朗：〈序〉，《秋色と秋色桜》（非賣品，1941），頁2-3。

²³ 法書會：〈會告〉，《書苑》第1號（東京：法書會，1911），頁14。

²⁴ 法書會：〈書苑發行趣旨〉，《書苑》第2號（東京：法書會，1911）卷末。

²⁵ 羅振玉〈扶桑再遊記〉，《劉學詢考察商務日記，黃環考察農務日記，羅振玉扶桑兩月記，羅振玉扶桑再遊記》（長沙：岳麓書社，2016）頁138。

²⁶ 羅振玉：〈跋〉，〔清〕王士禎撰、〔清〕宗室文昭補錄：《廣唐賢三昧集》（東京：西東書房，1910），卷末。

1910 年 3 月，田吳炤由西東書房以寫真金屬版發行此書複製本，卷首刊記曰「宣統元年荊州田氏後/博古堂用日本七條愷/氏所發明金屬版法印」（附圖 5）。唐本（日本對漢籍的稱呼）裝幀，封面貼簽條，版權頁信息為「金屬活字印刷」，「定價金八元」。另有五處分銷商（日文稱「賣捌所」），為琉璃廠文求堂書店、文友堂書坊、德古齋碑帖舖，以及上海校經山房與京城日韓書房（附圖 6）。《國粹學報》第 75 期（1911 年）「介紹遺書」欄介紹此書，並收錄刊記、羅氏跋文等資料。²⁷

同年 3 月 31 日（二月二十一日），戊戌變法後亡命日本、旅居橫濱的梁啟超購得影印本《廣唐賢三昧集》一部，日記云「前此未有刻本，其寫本落入朝鮮人之手，復歸日本人。展轉為荊州田吳炤所得，以金屬印刷法影印之，頗極精美，田今為使館參贊也」。²⁸對此種印刷技術評價甚高。

1910 年 7 月，田吳炤再次委託七條愷印行《說文二徐箋異》，裝幀、用紙均為唐本樣式，卷首有羅振玉序（宣統二年二月）、田氏自敘（光緒二十二年四月），卷末有田氏後敘（宣統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再識于日本芝公園寓廬）、李滋然跋（宣統二年二月十五日）。只是此次刊記未明載「七條愷氏」云云，亦無版權頁。儘管如此，《朝日新聞》「新刊雜書」欄仍介紹此書，稱「此書出世，不僅於理解《說文》大有裨益，於漢字研究者乃至一般漢字使用者亦有益」，定價 2 圓 50 錢，西東書房發行。²⁹

據明治 26 年（1893）《出版法》第七、八條規定，圖書卷末須明記發行者與印刷所之姓名、住所、發行年月日，以及印刷所地址。³⁰《廣唐賢三昧集》符合此規定，故推測主要在日本發行；而沒有版權頁的《說文二徐箋異》應該主要在清國發行。

1911 年，七條愷又複製出版張孝移³¹所藏祖父張裕釗書《蘭亭敘》《杜工部五律》《行書帖》法帖三種。張孝移曾留學早稻田，其時已任職大理院。1912 年，法書會出版部刊行楊守敬《學書邇言》，為 1911 年水野疎梅（1864-1921）在上海期間拜於楊門下時得到的口授資料，正文由凸版印刷株式會社以活字排印。1914 年前後，七條愷亦曾複製中村不折所藏敦煌經卷及《玉版洛神賦十三行》等。1916 年，法書會編輯部出版《袖珍五體字類》，宣傳語稱：「一般學生自然需要，公司、銀行等事務工作者亦有必要隨身常備一冊。」³²該

²⁷ 〈介紹遺書：唐廣賢三昧集〉，《國粹學報》辛亥第 1 號、原第 75 期（上海：國粹學報館，1911），卷末。

²⁸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九，《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 36。

²⁹ 《朝日新聞》1910 年 8 月 9 日。

³⁰ 《出版法版權法條例 附出版及版權願屆書式》（東京：敬業社，1893），頁 3。

³¹ 張孝移（1879-？），字棟生，湖北武昌人，1900 年 8 月自費留學東京，早稻田大學畢業。1907 年 2 月調入大理院，1908 年以正六品推事學習歷充詳讞處，兼充京師法律學堂教員。上海圖書館藏《同瀛錄（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調查）》（東京並木活版所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印行），頁 18。《內閣官報》「摺奏·叙官編」，1911 年 11 月。

³² 法書會：〈會告〉，《書苑》第 7 卷第 2 號（東京：法書會，1916），卷末。

書長銷於世，至 1940 年已發行至改訂第十三版，改名《增補五體字類》。《五體字類》今日仍是西東書房的代表書目之一，2014 年出版了「改訂第四版」，封面稱「跨越百年的暢銷書體字典增補改訂」，足見七條愷出版眼光之獨到。

回顧 1880 年代黎庶昌（1837-1898）、楊守敬（1839-1915）赴日訪書之舉，彼時對書籍仍以傳統審美為尚，多委託日本刻工以木刻技術覆刻善本。³³而到 20 世紀初，羅振玉（1866-1940）、董康（1867-1947）僑寓京都、複製典籍，已廣泛採用珂羅版、石印、照相金屬版等新式技術，由此可見出版技術的更迭與觀念的轉變。羅、董二氏既精通古籍、熱衷文獻搜求，又有旅居海外的經驗，眼界開闊，善於吸收新知。下一節將以羅振玉與七條愷的往來為線索，略窺彼時中國古籍複製領域對印刷新技術的取捨與好尚。

（二）羅振玉與七條愷

1916 年初，王國維（1877-1927）離開京都，旅居滬上，與羅振玉同鄉友人鄒安（1864-1940）同受聘於哈同花園，分別主編《學術叢編》和《藝術叢編》，多收錄羅振玉撰述及編纂的資料。這一年也是羅振玉出版、印書的小高峰。³⁴羅氏最信賴的印刷技師是前文提及的小林忠治郎，曾與其長期合作，1919 年回國後仍不時請小林複製資料，這種友誼一直延續到羅晚年。³⁵不過，1916、17 年間，羅振玉也曾與七條愷合作，目前可確認以下幾種資料：

《景祐天竺字源》七卷，高山寺舊藏平安時代寫本（今藏宮內廳書陵部），1916 年複製

《悉曇字記》一卷，吉澤義則藏寬治七年（1093）寫本，1916 年複製

《涅槃經悉談章》一卷，羅福萇舊藏日本鈔本，1917 年複製

《殷文存》二卷，1917 年複製³⁶

1916 年，羅振玉請內藤湖南聯繫東京帝室博物館館長、宮內省圖書寮圖書頭股野琢（1838-1921），申請影印刊行圖書寮藏高山寺舊藏平安時代寫本《景祐天竺字源》。³⁷與今日向日

³³ 石田肇：〈『古逸叢書』をめぐる——木村嘉平、そして『史略』——〉，《書論》（三重：書論研究會，1989），頁 172-190。

³⁴ 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 年），頁 65-66。張鴻鳴：〈維新以傳古——羅振玉與近代印刷技術〉，《印刷文化》2023 年第 1 期，頁 11。

³⁵ 佐藤進：〈董康日記に見る小林忠治郎〉，《二松》第 23 集（2009），腳註 2。瞿艷丹：〈影印《大清歷朝實錄》史事雜考〉，《中國出版史研究》2022 年第 4 期，頁 128-139。

³⁶ 佐藤進將這幾種圖書都斷為小林忠治郎以珂羅版影印，經目驗原本及參考羅振玉與王國維、鄒安通信，可知這幾種均為七條愷以寫真金屬版影印。

³⁷ 1916 年 7 月 7 日羅振玉致鄒安信，王貴忱、王大文編：《可居室藏書翰·羅振玉》（廣州：廣東人民出

本公私機構申請複製資料的方式一樣，若收藏機構尚未製作相關資料的膠片或照片，則需請印刷公司先拍攝製版，再以此印刷；並給出報價，明示拍攝、製版、印刷的大致金額，隨後訂立複製合同。也就是說，拍攝製版和印刷是兩筆費用。當然，若收藏機構已製作相關資料的膠片或照片，那麼申請者無需另付拍攝製版的費用，只需付複印費。彼時圖書寮所請的印刷公司擬價延宕，羅振玉數次在信中向鄒安解釋。同年，羅振玉獲謁吉澤義則（1876-1954）藏寬治七年寫本《悉曇字記》，擬收入《藝術叢編》，最初計劃以珂羅版縮印。他向鄒安說明時，特地指出珂羅版縮印「價與東京石印大本相等耳」，可見羅振玉對珂羅版的偏好，亦可推知鄒安等人複製資料時首選價格更廉的石印術。³⁸

羅振玉與《藝術叢編》合作期間，如刊行自己的著作或編集，通常先在日本以珂羅版等方式精印若干部，再郵寄至上海鄒安處，直接販賣原書之外，也會將之以石印複製的方式收入《藝術叢編》，還會以石印法複製刊行售價更廉的單行本。至於在日本的複製費用，原先約定由哈同花園提供部分。但哈同花園總管姬覺彌（1885-1964）似乎給付不及時，又或對複製法多有爭議，常引起羅振玉不滿，多在與王國維、鄒安信中抱怨。1916年9月5日，羅振玉致鄒安信中提及《景祐天竺字源》複製進度不理想，又云：

東京金屬版印刷遲遲，玻璃片寄去二十日，至今尚未見印樣，故弟近印各書仍在京都用玻璃板印，價雖貴數倍，卻便捷多矣。《殷文存》在東京印，七十七頁，印期至一月餘，尚有二十頁未印成，原約是一個月，東京商人更遠在京都之下也。³⁹

這裡提到的「玻璃片」，即拍攝資料照片後製作的感光玻璃片，可用於金屬版印刷。羅振玉為何要將玻璃片特意寄到東京？據前後文意可推測，應是上海方面不認同成本高昂的珂羅版，許諾出資的姬覺彌要求選擇更經濟的複製方式。但羅振玉對東京印工顯然很不滿意，認為效率低下，不守工期，因此其他書仍選擇在京都請小林忠治郎複製。是年4月15日，羅振玉在致王國維信中提及「今年更擬將《殷文存》編印（七條愷）」⁴⁰，兩相對照，可知羅致鄒安信中所說的「東京金屬版」「東京商人」即七條愷無疑。

1916年9月26日，羅振玉致鄒安信中提及，圖書寮的拍攝費較京都高出近四分之一。羅請日本友人自購玻璃片，並請圖書寮寫真師對《景祐天竺字源》拍攝製版，費用共

版社，2017），頁14。

³⁸ 1916年9月3日羅振玉致鄒安信，前引《可居室藏書翰·羅振玉》，頁18。

³⁹ 1916年9月5日羅振玉致鄒安信，前引《可居室藏書翰·羅振玉》，頁22。

⁴⁰ 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繼祖審定：《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58-59。羅繼祖按語「七條愷，殆京都某印刷局主人名」稍有誤，應為東京印刷商。

計 360 元。所謂圖書寮寫真師，即前文所述圖書寮聘用的外部印刷公司技術人員。《悉曇字記》在京都拍攝，共 43 張玻璃版，僅費 40 元。當時姬覺彌已照羅振玉此前為《景祐天竺字源》的報價匯款 300 元，故而羅振玉表示，超出預算的 60 元由他自己承擔，《悉曇字記》的拍攝費亦由他暫時墊付，待日後交付印刷款時一同匯來即可。上海方面似乎建議將玻璃底片寄滬印刷以節省印費，並仍堅持以石印術降低成本。對此，羅振玉表示，「玻璃不好寄，定損壞也。原書乃鎌倉時代寫本，非宋版，已由股野館長書中說明，其紙色甚黑，不能石印，惟東京金屬板尚可做，茲將用金屬版印之」，並另付一紙，對《景祐天竺字源》《悉曇字記》二書影印複製作出詳細報價。今據之整理如下表（附表 2）：

附表 2：兩梵書（《景祐天竺字源》《悉曇字記》）印工預計帳

書名	玻璃板張數	印刷部數	葉數	用紙張數	紙張費用	印刷費用
景祐天竺字源	270	300	135	25,500	255 元	204 元
悉曇字記	43	300	22	6,600	66 元	52.8 元
合計	—				577.8 元	

紙張費用：0.01 元（10 釐）/張

總用紙算式： $135 \times 300 \div 2 = 20250$ （景祐天竺字源）

$22 \times 300 \div 2 = 6600$ （悉曇字記）

印刷費用算式： $204 \div 0.004 \div 300 = 170$ （葉）（景祐天竺字源）

$52.8 \div 0.004 \div 300 = 44$ （葉）（悉曇字記）

出典：1916 年 9 月 26 日羅振玉致鄒安信（推算結果與賬目不合處以灰色標記）。

雖然羅振玉對印刷市場與技術極為熟稔，但細驗賬目，仍發現若干齟齬。若《景祐天竺字源》製作 270 張玻璃版底片，印刷 135 葉，那麼用紙應為 20,250 張，紙張費用為 202,5 元。而若從印刷費用反推，則《景祐天竺字源》應為 170 葉，340 張玻璃版底片，那麼 25,500 張的數字也無誤。七條愷應向羅振玉出示過報價單，不應有這類錯誤，或許是轉鈔時出現的訛誤。此外尚須書封、序文及郵寄費用，羅振玉估算共計六百元。⁴¹今覈驗《景祐天竺字源》複製本，一函四冊，封面用靛藍和紙，內文為堅密和紙，即羅振玉致鄒安信所云「伊豫整張」（產自愛媛的伊予和紙）。正文共 170 紙，另卷末附羅振玉跋文一紙，羅福萇〈埤記〉三紙。亦可證明羅振玉信中所云《景祐天竺字源》應為 170 葉、製版 340 張。

1916 年 11 月 12 日，羅振玉將影印完畢的兩箱《景祐天竺字源》《悉曇字記》經郵船

⁴¹ 1916 年 9 月 26 日羅振玉致鄒安信，王貴忱、王美文編：《可居室藏書翰·羅振玉》，頁 28-32。

寄給上海的姬覺彌。⁴²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有一部 1935 年 10 月 5 日入藏的《悉曇字記》複製本，封面為土黃色酸性紙，內文用中國產宣紙，卷首葉正面題「悉曇字記」，背面題「上虞羅氏印」，為羅氏筆跡，然此本顯非當初羅振玉以寫真金屬版複製的印刷品，而是字跡邊緣油跡漫漶的石印本。⁴³又見京都古本屋斐求堂書店在網路公開寶玲文庫舊藏「中華民國六年影印」《悉曇字記》書影。細審圖片，格子紋樣和紙封面內又有土黃色唐紙（中國紙）封面，左上貼石印簽條，書名下題「倉聖明智大學校刊行/溧陽強運開署檢」。卷端書名亦為強運開所題，其下鈐「夢漁」（朱文）。刊記「中華民國六年歲次/丁巳夏正二月石印」。強運開字夢漁，號漁叟，江蘇溧陽人，精篆、隸、石鼓文。⁴⁴正文用紙似為和紙，字跡無油跡，似非石印。卷末版權頁上書「版權所有/毋許翻印」，下云「悉曇字記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三元/上海倉聖明智/大學校刊行」。⁴⁵孔夫子舊書網亦見有「倉聖明智大學校刊行」字樣的複製本，但外無和紙封面，僅有土黃色唐紙封面。⁴⁶此前鄒安曾詢問羅振玉能否在影印本版心下印「倉聖大學」字樣，羅振玉回覆稱「此是古寫本，不能於書口加「倉聖大學」字，但能於書面加之。《天竺字源》若付印，亦不能於書口加此等字。阮文達、金瘦仙每於三代彝器上刻字，此千古笑柄；⁴⁷若於北宋寫本及北宋刻本書上加此等字，其笑柄更遠在彝器上刻字之上也」。⁴⁸可知羅振玉認為姬覺彌、鄒安缺乏日本寫本的知識，亦不認同他們的影印理念。

那麼，《悉曇字記》複製本為何會有以上三種不同形態？羅振玉 1916 年寄回上海的一箱《悉曇字記》自為七條愷寫真金屬版影印，姬覺彌、鄒安收到後又加裝中式封面及註明「聖倉明智大學校」版權的封面與版權頁。此本日後再回流日本，可能又加裝了和紙封面。羅振玉手頭應該也有若干部寫真金屬版影印的《悉曇字記》用於贈人、出售，自然不會標註「聖倉明智大學校」，故而卷首題端均出於羅氏之手。日後羅振玉回國，在天津日租界開辦貽安堂經籍舖，出售自印書籍，中有《悉曇字記》，雖標註「無書」⁴⁹，但也很可能重以更受中國市場歡迎的石印術複製此本。

⁴² 1916 年 11 月 13 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信，前引《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189。

⁴³ 孔夫子舊書網亦見數種石印本《悉曇字記》，與京大文學部藏本樣式、用紙相同。

⁴⁴ 馬輝、于立文編著：《中國書法家大辭典》第二卷（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11），頁 942。

⁴⁵ 參見 https://www.kosho.or.jp/products/detail.php?product_id=401077893。（最後訪問日期：2025 年 6 月 20 日）

⁴⁶ 參見 <https://book.kongfz.com/214741/5750219813>。（最後訪問日期：2025 年 6 月 20 日）

⁴⁷ 承北京故宮博物院器物部金石組熊長雲先生指教，漢「大吉」鍾底刻「阮元寶用」，容庚：《漢金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卷二，頁 9（總頁 216）；漢「汧共廚」鼎足內刻「阮元寶用」，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集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頁 273-275，謹此致謝。另，漢「橐邑家」行燈底銘「金猷廷藏」，瘦仙為猷廷字，陳郁：《拾金不昧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 102-103。

⁴⁸ 前引 1916 年 9 月 3 日羅振玉致鄒安信。

⁴⁹ 「羅雪堂先生校印書籍價目 丙 日本古寫本」《天津貽安堂書目》（天津：博愛印刷局），頁 4。

至於《涅槃經悉談章》，底本為稍後羅振玉次子羅福萇（1896-1921）於書肆中購得之日本鈔本，羅振玉於 1917 年影印此本，與前兩書合稱「悉曇三書」。今檢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本，知其開本、裝幀、用紙、印刷風格與《景祐天竺字源》複製本完全相同，可推測亦出於七條愷之手。

另，1916 年 5 月 10 日羅振玉致王國維信中提及，近來在修改增補《殷墟書契考釋》，「擬屏除一切，將《考釋》寫定一清本，寄饒君仿宋書之，以便寄七條愷用金屬版印百部，俟第三次修正，然後刊版也」。⁵⁰不過以上諸書均未在刊記或版權頁處標明「七條式寫真金屬版」云云，或許是出於羅振玉對於影印資料的審美，不欲過度強調印刷商之名；又或認為印刷商並非重要信息，因他請小林忠治郎複製的大量資料亦未標註小林之名。羅振玉此後似未見與七條愷合作，或許是因為 1916、17 年前後的短暫來往並未使羅氏與七條愷建立起信任關係，羅氏更願就近選擇成本雖高但質量更佳的珂羅版印刷。事實上，不久之後，七條愷的印刷出版事業再次經歷重要轉型，迫使他在寫真金屬版之外開發新的領域。

四、七條愷與古典保存會複製書

1923 年 3 月，七條愷與植松安（1885-1946）、橋本進吉（1882-1945）、正宗敦夫（1881-1958）、山田孝雄（1875-1958）、猪能信男（1882-1963）等學者結成古典保存會，由上田萬年（1867-1937）、新村出（1876-1967）擔任顧問。該會主旨是「以備有文獻價值的古代典籍萬一亡佚，以資學者研究」，主要複製出版日本所藏寫本、書蹟。第一期預計在兩年內複製 10 種典籍，會員需在兩年內每月繳納會費 2 圓 50 錢。保存會核心人物是日本國語國文學者山田孝雄，七條提供技術和財源支持。與此前大量出版的書法碑帖相比，古典保存會選定複製的資料更具學術價值，圖像全用「寫真玻璃版」（即珂羅版）印刷，卷末附解題。⁵¹同年 9 月 1 日，關東大地震發生，東京帝國大學圖書館等藏書機構損失重大。災後，各公私機構均痛感古籍複製之急迫與必要，相繼興起古籍複製事業，這項傳統延續至今。⁵²1924 年至 1943 年間，古典保存會共推出 8 期叢書，共複製 82 種和漢古籍，凡 76 冊、21 帖⁵³，至今為學界所用，通稱「古典保存會複製書」。

⁵⁰ 前引《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 82。

⁵¹ 〈古典保存會會員募集〉，國學院大學《國學院雜誌》第 29 卷第 5 號卷末廣告，1923 年 5 月。1923 年的 1 日元約為今日 500 多日元。

⁵² 小森正明：〈宮内省・宮内庁における古典籍複製事業の沿革とその意義〉，《書陵部紀要》第 65 号（2014），頁 64-75。

⁵³ 原計畫刊行共計 82 種。但第八期《長秋詠草》雖已完成印刷，實際僅將尚未裝訂之部分寄送予乙種會員；原預定寄送予需裝訂成冊之甲種會員者，尚未發出便因製本所遭戰火，複製品全部焚毀。故若不將該種計入叢書，則全套數量亦有計為 81 種，總計 75 冊並 21 帖的說法。川島五三郎、八木敏夫編：《三訂版 全集叢書總覽：明治初年-昭和三十年》（東京：八木書店，1952），頁 17。

山田孝雄與七條愷至遲在 1916 年已有合作。1916 年，山田孝雄為今宮內廳書陵部藏天治元年（1124）寫本《新撰字鏡》（全 12 卷）複製本撰寫考異並索引。此書複製由大槻文彥（1847-1928）牽頭，申請獲得帝國學士院的研究經費及攝影費、金屬版製造費補助，刊行共 250 部。印刷師是七條愷與矢田勇⁵⁴，矢田勇也曾任法書會幹事（附圖 7）⁵⁵，應為七條愷助手。山田孝雄校勘《新撰字鏡》期間，常去當時宮內省管轄的帝室博物館借閱資料。與天治寫本《新撰字鏡》裝在同一箱的還有大治三年寫本《一切經音義》。後來，黑川真道（1855-1925）告訴山田，該大治本《一切經音義》很有價值，亦有必要複製。⁵⁶山田與東京帝國大學的語言學家上田萬年（1867-1937）提及此事，上田表示這樣貴重的書應盡快複製刊行，公諸於世，並命山田具體調查複製方案。山田調查大治本版本信息的同時，請七條愷估算複製刊行本書所需費用。上田向帝國學士院申請補助，但因此本有關卷（闕第二、三帖，即卷三至卷八），且費用太高，未獲得補助，複製計劃暫告中止。

1918 年 1 月，時任帝室博物館總長兼圖書頭的森鷗外（1862-1922）對《一切經音義》也很感興趣，命山田編輯索引。山田又與上田相商複製事宜，提出以宋版大藏經所收《一切經音義》補其缺卷，改為更節約成本的小開本。上田重新向帝國學士院提出複製申請，這次得到了 1767 圓 50 錢的經費，分兩年交付。山田與上田選中七條愷負責印刷。七條愷遂得往帝室博物館拍攝大治本和宋版大藏經中的《一切經意義》。1918 年秋，森鷗外到奈良出差，主持正倉院曝涼活動，發現了聖語藏中《一切經音義》的零本及記為「不知題經」的殘卷，請山田調查。山田調查後判斷，這就是《一切經音義》卷六的殘本，遂將此收入複製本附錄。1919 年 5 月，山田在朝鮮奎章閣調查高麗版《大藏經》，發現其中《一切經音義》卷三至卷八的完本，亦計劃複製補入。1920 年，大治本製版完成，進入校勘階段。宮內省宋版的拍攝及正倉院本的製版都已完畢。7 月 19 日，試印完成，預計次日開始著手宋版製版。但當天夜裡七條愷的製版所突發火災，化為灰燼。七條愷多年來苦心搜羅積累的墨寶名畫之寫真版一無所存，損失難以估量。

一周後，七條愷從灰燼中發現一木箱，打開看，是帝室博物館藏大治本的照片及山田孝雄加以校正的試印本。雖略有濡濕，邊角有灼燒痕跡，但整體毫發無損。烈火中得以倖存，堪稱奇跡。當日薄暮，七條愷驅車來到山田家，討論具體事宜。他對山田說：「這實在是神佛加護。我發誓要完成此書。費用之類一概不論。」隨後，重啟複製工作。由於宮內省藏宋版大藏經本的照片已不存，亦未製版，故而山田孝雄決定以高麗版《大藏經》代之，以寺內正毅（1852-1919）舊藏高麗版《大藏經》為底本。經歷種種波折，1921 年 12

⁵⁴ 大槻文彥：〈跋〉，昌住：《新撰字鏡》卷十二末（東京：六合館，1916）。

⁵⁵ 《書苑》八卷第五輯卷末「謹賀新年」廣告（東京：法書會，1918）。

⁵⁶ 此本今藏宮內廳書陵部，全文電子影像已公開：

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bib_detail?bibid=043740（漢籍集覽）。

月 30 日，複製工作終於告竣。⁵⁷但此時山田孝雄的索引尚未完成，原計劃等索引完成後與複製本同時刊行，遂將複製本暫存於七條製版所。但 1923 年 9 月 1 日關東大地震之際，七條製版所再次化為灰燼，保存其中的複製本也遭災厄，僅有十部試印本存於人間。山田與七條討論後決定，先於 1925 年出版體量較小的索引。又過了六、七年，在內藤湖南的支持下，七條愷復奮起投資，大治本《一切經音義》複製本終於在 1932 年刊行面世。⁵⁸如此跌宕起伏的經歷，想必令山田和七條都很難忘，也為古典保存會近二十年的合作奠定了堅固的友誼基石。

在森鷗外（1862-1922）日記裡，1918 年至 1922 年間，亦能看到七條愷的身影。「七條愷至。」（1918 年 5 月 29 日）「七條愷家火。來告一切經音義版存。」（1920 年 7 月 25 日）「七條愷至，品定一切經音義紙。」（1921 年 1 月 26 日）「七條愷來咨經音義附錄事。」（1921 年 6 月 13 日）「七條愷至。」（1922 年 1 月 13 日）⁵⁹可見七條愷對複製品的用紙也用心講究。

在古典保存會複製書之前，七條愷主要使用的複製技術都是寫真金屬版，這也是他在名家林立、競爭激烈的東京印刷出版業界安身立命的本領。不過，1924 年起刊行的古典保存會複製資料全部使用珂羅版印刷。這種選擇與變化的原因是什麼？珂羅版技術在明治年間傳入日本，最早用於印刷照片、明信片等。1889 年，岡倉天心、高橋健三等人創刊《國華》；1899 年，日本佛教真美協會發行《真美大觀》，圖版用到了珂羅版、木版多色印刷技術，承印珂羅版的是日本近代攝影史上著名的技師小川一真（1860-1929）。珂羅版印刷出的圖像無網點，精美巧致，可高度還原圖像細節，但很考驗技師技術，造價也高於寫真金屬版，一次製版，通常只印 150~200 部，至多 300 部。因此，以珂羅版複製的出版物很昂貴，並非面向大眾消費群體，而是面向收藏家、專門研究者，或作為宣傳日本文化之美、收藏之富的禮品贈送海外機關個人。⁶⁰七條愷的西東書房自創立之初，走的就是更大眾的路線，不論是翻印西文資料還是碑帖書法，都走大量印行的路徑，不會以「僅製若干部」的方式吸引讀者。況且，對於一般消費者而言，碑帖書法蘊含的細節遠少於繪畫、佛像、建築等美術品，如果只是作為習字範本，那寫真金屬版印刷品已足堪用。

1920 年 7 月的火災與 1923 年 9 月的關東大地震，對七條愷的印刷所造成連番打擊。

⁵⁷ 山田孝雄：〈一切經音義刊行の顛末〉，《一切經音義索引》（東京：西東書房，1925），卷末。

⁵⁸ 山田孝雄：〈本書再刷の次第〉，《一切經音義》卷一卷首部分（東京：西東書房，1932），頁 15ab。

⁵⁹ 森鷗外：《鷗外全集》著作篇第 2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38），頁 412、479、493、502、518。

⁶⁰ 明治末年，住友家第十五代主人友純曾刊行自家藏品圖譜，曰《泉屋清賞》。友純憾其刊印未精，考論未備，又請國華社增訂改印，用木版印刷、珂羅版印刷製成五巨冊，窮極工巧，在《西清古鑑》之上，「歐美諸國學者皆瞠目為不能及」。1926 年，友純去世後，其子友成繼承父志，就前次所著錄各編詳加刪訂，仍以珂羅版印製圖版。友成打算攜帶這些精美的圖錄遊歷歐美諸國，贈送彼邦美術館及收藏家。內藤湖南：〈序〉，濱田耕作等編：《泉屋清賞 續編 彝器部 佛象附》（1916），卷首。內藤湖南：〈序〉，住友友成編：《泉屋清賞 刪訂》（1934），卷首。

當時，一些出版社、印刷所因此破產，再不見活躍。但七條愷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後，還是重啟出版事業，將之分為兩大門類：其一是延續此前傳統的碑帖書法類，其二就是為山田孝雄主導的古典保存會以珂羅版精製古籍副本。前者仍走大眾路線，後者則少量精印，主要供研究者所用。

七條愷對複製出版的鍥而不捨不僅出於熱心，更因其有相當的經濟實力。他在客流量很大的上野公園內擁有三間飲食店：茶屋鶯亭、新鶯亭、東華亭，都是經常出現在當時人記錄中的名店。⁶¹其中新鶯亭成立於 1915 年，如今已傳至第四代，是東京有名的米粉糰子老店。1914 年，廉泉（1868-1931）東遊之際，七條愷曾於鶯亭別墅招飲，並告知昔年吳汝綸東遊時，曾宴集於此。⁶²沒有資料表明七條愷會說漢語，七條愷與中國文人學者往來時可能是通過筆談。

到 1922 年為止，西東書房和金屬版印刷所的地址一直是「東京市神田區佐久間町一丁目一番地」；而自 1925 年起，西東書房和金屬版印刷所的地址均改為「東京市神田區花房町四番地（秋葉原驛前）」。可知關東大地震之後，七條愷搬遷了印刷所與發行所，當然，新址在舊址西側，距離不足千米。重建後的金屬版印刷所開啟了珂羅版業務，此時七條愷已年屆六旬，此前並未在他的出版廣告中見過關於珂羅版的宣傳語，該技術應不是他本人的特長，而出自七條家族另一位印刷技師。下一章就來考察這位印刷技師的事業與成績。

五、七條家族與珂羅版印刷技術

（一）西東書房的珂羅版部門

1918 年，畫家田中有美（1840-1933）經七條愷的金屬版印刷所發行了《一遍上人繪卷》（卷九、十），印刷者是七條憲三，用寫真金屬版複製，其地址與金屬版印刷所地址一致。該時期起，七條憲三的名字開始頻繁出現在《書苑》雜誌上，可知他收藏了不少名品碑帖。1921 年，岡倉秋水（岡倉天心侄，1869-1950）出版了乃師狩野芳崖的《芳崖先生遺墨集》（全二卷），印刷者是七條憲三，印刷所為金屬版印刷所，發行所為西東書房，它們的地址都是「神田區佐久間町一丁目一番地」，可以推測七條憲三應為七條愷家人，可能是父子關係。⁶³此二冊裝幀精美，原畫全用珂羅版影印，每張圖版前均覆半透明玻璃紙，

⁶¹ 玉林晴朗：〈上野四方山話〉，《武藏野》第 26 卷第 11 號（1936），頁 20。

⁶² 廉泉：〈七條愷招飲於鶯亭別墅，為言往年吳先生東遊時曾宴集於此。七條之友菊池晉復出示桐城父子寫贈詩扇各一。越日以詩謝七條，兼呈菊池〉，《南湖東遊草》（北京：朝華出版社，2018 年影印本，收入「清末民初文獻叢刊」），葉 5b。按廉泉妻吳芝瑛父為吳汝綸弟。

⁶³ 一則民事案例顯示，七條愷曾於 1945 年 1 月 31 日收養田村愷（1934 年 3 月 30 日生）為養子，1945 年 12 月 30 日七條愷死亡後，七條憲三成為田村愷的監護職務代理人。這間接說明了七條愷與七條憲

其上有作品名、作者、畫幅尺寸、繪畫類型、藏家信息、解題，印刷細膩精緻，沿用《國華》《真美大觀》等當時一流美術複製畫集的風格。這是西東書房此前出版物中未曾見過的樣式，可以視為金屬版印刷所珂羅版業務的啼聲首試。

在前文所云山田孝雄複製的大治本《一切經音義》中，山田在刊行始末中除隆重感謝七條愷之外，還感謝了協助七條愷攝影製版的矢田勇、七條憲三、青木貞太郎。⁶⁴不過《一切經音義》用的是寫真金屬版印刷，因為該項複製計劃的預算最初由七條愷制定，在經費有限的前提下，應無可能選用更昂貴的珂羅版。

就在七條愷自關東大地震的打擊後重啟事業的 1925 年，七條憲三也正式開始了珂羅版影印複製的工作（附表 3）。是年五月，七條憲三為古典保存會成員植松安（1885-1945）以珂羅版影印《植松茂越遺墨》，版權頁「印刷所/發行所」下僅記「七條憲三」，不見寫真金屬製版所或西東書房之名，地址為「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三番地」，這也是日後七條憲三長期使用的地址，位於西東書房神田佐久間町舊址西南方，直線距離 5 公里多。⁶⁵這一年，七條憲三還以個人名義為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掛（後為史料編纂所）出版《古簡集影》（第 1 至 5 輯）。該系列發刊要旨云：

互古典籍稀見之翰墨，一旦亡佚，再不復獲。古來雖難逃水難、火災、鼠害、蠹蝕，是故貴重文獻歸於湮滅者之多，殊為有志於學者所共痛惜也。大正十二年九月大震火災之際，本掛書庫雖幸免於禍難，至於諸家珍藏，忽焉歸於灰燼者甚多。詳及當時實況，無比悔恨為何當初不曾製作複本。職掌書之任者，豈可徒然袖手旁觀，只待祝融陽侯之災厄耶？曩時，本掛以普及歷史知識為目的，挑選通俗有趣之史料，題曰「史林聚芳」，刊行出版。今番選出特別珍稀且有益的專門性資料，題曰「古簡集影」。以玻璃版等法發刊，欲使其與原形髣髴。乃於茲集印刷技術之粹，用紙亦以永遠保存為目的，特用專門抄紙法製成。庶幾可傳先世文華餘芳於後代，以得永除史料湮滅之憂。⁶⁶

三應為很近的親屬關係。谷口知平：《家族法判例研究》（東京：有斐閣，1981），頁 166-168。據昭和年間日本著名古書店主人反町茂雄回憶，七條憲三非常富有，有包括上野公園的東華亭在內的大量土地和房產。而據前文可知，東華亭原為七條愷所有，由這種繼承關係推測，七條憲三很可能是七條愷之子。反町茂雄編：《紙魚の昔がたり 昭和編》（東京：八木書店，1987），頁 485。

⁶⁴ 前引山田孝雄：〈一切經音義刊行の顛末〉。

⁶⁵ 七條憲三在芝區西久保廣町的印刷所據說從 1919 年起已開業，致力於文物保存的吉田幸三郎（1887-1980）曾與他共同經營印刷所約十五年，主要從事美術出版。美術研究所編《日本美術年鑑（昭和 56 年版）》（東京：大藏省印刷局，1983），頁 244-245。

⁶⁶ 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古簡集影發刊趣意〉，《古簡集影》（東京：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1925）封套外。引文為筆者自譯。

《古簡集影》共 14 輯，第 6 至 10 輯於 1930 年刊行，此時七條憲三的发賣所已為「七條書房」，地址為「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六番地」。第 11 至 14 輯於 1932 年刊行。

在七條憲三成立七條書房之前，他也為七條愷的金屬版印刷所以寫真金屬版複製資料，如 1925 年 3 月佐佐木信綱編輯發行的《校本萬葉集》（全 20 卷）。1926 年，古典保存會出版發行的《催馬樂抄》封底粘有一張折疊的長條廣告，「九條公爵家御所藏 九條家本延喜式神名帳」，裝幀樣式是「卷軸，二卷，桐箱入，表紙錦裂地，天頭金銀砂子，上卷五十五尺余，下卷七十七尺余，天地九寸二分，用紙越前產，特別抄製鳥之子紙，解說十四頁，粘葉裝訂」，以珂羅版印行三百部，「去冬頒布有緣者，尚餘數十部」，每部 35 圓，頒布者七條憲三。⁶⁷此書 1925 年 10 月發行，發行者是「官幣大社稻荷神社」。書箱內附有小冊，即神道學者宮地直一所撰解說，「印刷用原寸大小的玻璃版複製，卷子本題材亦依原形。裝幀因不知原本樣式，用造神宮技師井上清監督下製成的蘇方底色小葵紋樣，題簽用原文卷尾的文字，外裝標題請出雲路通次郎賜題」。⁶⁸該複製本與《古簡集影》式的資料合集不同，不僅高度還原資料文本原貌，也極力還原資料的裝幀、儲存樣式。這後來成為日本古典籍複製領域通行的做法，直至今日。如此不惜成本、極盡精工的複製背後，有當時日本國文學研究領域高揚的民族主義浪潮作支撐，影印出版這類本國文史資料可彰顯所謂帝國文化之光彩，或許更容易獲得經費。

（二）七條憲三與古籍複製

1923 年關東大地震後，舊加賀藩前田家第 16 代主人利為決定複製家族世代收藏的古文書與古籍，以備萬一。為推動史料保存與複製事業，於 1926 年 2 月成立公益法人育德會財團（今稱公益財團法人前田育德會），刊行「尊經閣叢刊」（附表 4）。1926 年 6 月刊行第 1 種《古語拾遺》，直到 1952 年第 66 種《建治三年記》。⁶⁹1973 年，該複製事業重新啟動，今日仍有「尊經閣文庫善本影印集成」。

「尊經閣叢刊」皆用珂羅版複製，主要承印的印刷部門或個人有審美書院、大塚巧藝社（大塚稔）、倉田石、七條憲三。就目前調查可知，七條憲三至少複製了其中的 13 種，此外至少審美書院 7 種、大塚巧藝社（大塚稔）16 種、倉田實 10 種。值得注意的是，尊

⁶⁷ 《催馬樂抄》（東京：古典保存會，1926），封底。

⁶⁸ 《九條家本延喜式神名帳》（京都：官幣大社稻荷神社，1925），附解題冊。

⁶⁹ 據〈前田育德會と尊經閣叢刊との關係に就て〉（《建治三年丁丑記》卷末折頁，東京：前田育德會，1952 年）稱，日本戰敗後，財團法人前田育德會持有的有價證券已喪失價值，因此無法像從前那樣展開各種文化活動。1951 年刊行的《金剛童子法》為尊經閣叢刊第 65 回，《建治三年記》為第 66 回。將來是否還要繼續複製古籍，在眼下的財政情況下，一切都是未知數云云。又據尊經閣文庫 1961 年整理〈尊經閣叢刊略解題〉（《文獻》第 5 號，東京：特殊文庫連合協議會，1961），收載書目 64 種。今據圖書館藏書整理「尊經閣叢刊」，共得 67 種。

經閣叢刊 67 種中 11 種漢籍（包括朝鮮本、在日本定義為「準漢籍」的日人漢文著作），有 6 種為七條製作。因此可以說，七條憲三是尊經閣叢書中漢籍部分的主要承印者。

1928 年，憲三複製的宋版《重廣會史》（附圖 8、附圖 9），去除珂羅版複製品常見的灰度，裝幀樣式一仍原書，「連書衣也用珂羅版印刷，看上去真象歷時有年的文物」⁷⁰，符合藏書家的漢籍審美，深受好評。其學術價值也很快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北京圖書館月刊》在此書面世後不久即刊出書訊，詳析版本，將此複製本列入館藏善本範疇。「此書雖非全帙，其所引諸史，自出北宋監本，或更有前於監本者。核以今本，自當有一二異同可資校訂。固非僅以中土久佚之秘笈重之，爰列諸善本書類，並詳記之，為學者告焉」。

71

這一年，由內藤湖南等人主持、大阪每日新聞社發行的「秘籍大觀」系列複製出版了今宮內廳書陵部藏南宋單疏本《尚書正義》，印刷者是京都的小林忠治郎。七條與小林複製的這兩種漢籍不僅選用了相同的技術、從內容到裝幀形式都極力接近原書，還有相似的複製印記。如《尚書正義》每冊卷末均有朱文方印「宮內省圖書寮藏/本宋槧本尚書正/義昭和三年印行/大阪每日新聞社」，《重廣會史》每冊卷末鈐朱文長印「尊經閣叢刊重廣會史/原本前田侯爵家藏」（附圖 10）。後來東方文化學院出版的「東方文化叢書」亦沿襲了這種格式，七條憲三就是該叢書東京方面的承印者之一。1936 年，傅增湘將南宋單疏本《周易正義》寄至小林忠治郎處，以珂羅版影印二百部，就要求「紙幅裝訂與《尚書》一律」。傅氏跋文亦云「郵致東瀛，選集良工，精摹影印，板式若一，點畫無訛，紙幅標題，咸存舊蹟，庶與東邦覆印《書疏》聯為雙璧」。⁷²可見珂羅版《重廣會史》《尚書正義》等書為中日兩國藏書界、學界確立了高標準複製本的基本樣式。

前文提到，1924 年至 1943 年間，古典保存會以珂羅版複製了大量典籍。古典保存會複製資料卷末版權頁不見七條憲三之名，「發行兼印刷者」為「古典保存會」，僅記代表者七條愷，印刷所為金屬版印刷所。而在當時學者的回憶中，古典保存會的寫真複製事業中經常被提起的技師則是七條憲三。⁷³1933 年 1 月，古典保存會複製刊行東北大學藏永祿二年古寫本《君臺觀左右帳記》，文化財專門審議會專門委員會脇本十九郎據此整理校刊，曾感謝「經七條憲三君之手而成的鮮明複製本」。⁷⁴由此可以推測，七條憲三應是古典保存

⁷⁰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 44。

⁷¹ 〈重廣會史五十卷〉，《北京圖書館月刊》第 1 卷第 3 號（1928 年 7 月），頁 158-160。

⁷² 蘇枕書：〈傅增湘影印南宋監本《周易正義》之始末〉，《歲華一枝：京都讀書散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頁 148-162。

⁷³ 大野晉：〈解說〉，《橋本進吉博士著作集》第 3 冊《文字及び仮名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9），頁 308。

⁷⁴ 脇本十九郎：〈永祿二年古寫本《君臺觀左右帳記》〉，《美術研究》第 20 號（東京：帝國美術院附屬美術研究所，1933 年 8 月），頁 28。

會複製工作的實際承擔者。

1936年起，七條憲三成立「貴重圖書複製會」，主要複製出版日本國文學領域的貴重資料。為古籍撰寫解說的有山田孝雄、佐佐木信綱、宮地直一等日本國文學學者。該會運營模式與古典保存會相似，先召集會員，征收會費，再定期向會員發放非賣品的珂羅版複製品。貴重圖書複製會資料版權頁僅有「發行所 貴重圖書複製會」，「發行兼印刷者 七條憲三」，有時亦標註「印刷所 七條印刷所」，地址均為「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六番地」，可視為七條憲三獨立於西東書房之外的個人業務。貴重圖書複製會的活動大約在 1944 年中止。戰後，有以該會為名義出版的《道果本古事記》，但印刷與發行處已是東京的吉川弘文館。

1952 年，神田神保町創業於明治 36 年（1903）的一誠堂書店第二代主人酒井宇吉（名賢一郎）發起「貴重古典籍刊行會」（附圖 11），旨在以珂羅版複製稀見古籍，請山田孝雄、神田喜一郎任顧問，可見和漢古籍並重的取向。刊行概要中特地指出，「複製為珂羅版印刷，七條憲三氏擔當」。⁷⁵該會複製活動到 1960 年刊行知恩院藏《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啟》為止，珂羅版印刷者均為七條憲三，地址與戰前一致。二十餘年後的 1981 年，「貴重古典籍刊行會」又刊行了數種資料，此時七條憲三早已去世。

有關七條憲三的個人資料非常少，只知其明治四十年（1907）七月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寫真專業進修，⁷⁶二戰結束後曾在東京八木書店幫忙做會計，精於珂羅版印刷，十分富有。⁷⁷在山田孝雄之子山田忠雄的回憶中，憲三「常年從事古典寫真複製實務」，「有所謂的名人氣質，與家人不相容，與弟子也相處不善，因此晚年很不幸」。⁷⁸山田父子與憲三合作多年，忠雄也是貴重古典籍刊行會的幹事，想必頗曉內情，只是不知究竟如何「不幸」。

前文推測憲三可能是七條愷之子，按照日本的起名法，名內帶「三」者可能是第三子。日本家族法傳統為長子繼承制度，七條憲三雖有精湛的珂羅版技術，但並未繼承西東書房。二戰末，東京受到空襲，西東書房的珂羅版工房未能倖免。⁷⁹1945 年 12 月 30 日，七條愷去世。1951 年起，西東書房恢復出版活動，延續此前七條愷專精的碑帖書法類資料，不少此前已出版的重印本或修訂版，版權頁上發行者的名字變成了七條兼三（1917-1989）。兼三是七條愷之孫，七條尚義長子⁸⁰。尚義夫婦早亡，兼三自小在祖父身邊長大，1939 年

⁷⁵ 〈貴重古典籍刊行會に就て〉，酒井宇吉編：《一誠堂古書目錄：創業五十周年紀念》（東京：一誠堂書店，1955），卷末廣告。

⁷⁶ 《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明治 22-44 年）》（東京：東京高等工業學校，1910），頁 28。

⁷⁷ 前引反町茂雄編：《紙魚の昔がたり 昭和編》，頁 485。

⁷⁸ 山田忠雄：〈序〉，橫山重編：《竹林抄古註》（貴重古典籍叢刊 2，東京：角川書店，1969 年），頁 5。

⁷⁹ 小宮豐隆、麻生磯次、能勢朝次監修：《芭蕉講座》（東京：東京創元社，1955），第 3 卷（傳記篇），頁 92-93。

⁸⁰ 明治末至大正初年，七條尚義是鶯亭的經營者，可以推測他是七條愷之子。宮崎憲文編：《東京職業明鑑》（東京：工友社，1911），頁 307。宮崎憲文編：《第貳版 東京（附一府六縣）職業明鑑》（東京：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經學科。1946年兼三將西東書房改為股份有限公司，1953年成立秋葉原無線電會館，1960年將西東書房合併入無線電會館。七條兼三愛好圍棋、將棋，生前獲將棋七段。目前尚無資料顯示他像七條愷、七條憲三那般親手參與印刷實務。憑藉祖輩積累的財富與產業，他已不再是技術工作者，而專注於經營管理。在兼三時代，西東書房仍持續活躍在法帖圖書出版領域，並拓展至將棋類資料的出版。⁸¹但此時已不見珂羅版部門的存在，兼三與古籍複製業界、學者之間的聯繫亦趨於淡薄。某種意義而言，兼三雖無意深涉複製技術，與學術圈無甚往來，但其善於經商、堅守西東書房刊行書法資料的傳統，確實延續了七條愷一貫的風格。

六、結語

本文以東京七條愷家族幾代延續的印刷出版事業為核心，重點考察從明治年間至二戰結束前後，古籍複製領域中印刷技術的發展與演變。文章試圖釐清不同時期、不同類型出版物所採用的主要複製技術，並關注各世代學者與印刷技師在技術選擇與複製對象取向上的差異。

例如七條愷這類經歷幕末明治變革時代的出版商兼技術者，其進入印刷出版行業，與其說出於個人志趣，不如說是順應了明治以來學制變革與知識啟蒙所帶動的出版熱潮。當時教科書、報刊等印刷品需求大增，出版遂成為眾多有志於傳播新知、參與時代潮流者得以涉足的重要領域。七條愷與吳汝綸、廉泉、田吳炤等清末民初赴日的中國知識人互有往還，交流形式仍多為傳統的漢文筆談、詩酒唱和的模式。而生活據點長期在京都的羅振玉並未和七條愷結下這樣的緣分。熟悉多種印刷技術優劣的羅氏，對七條愷的技術評價並不高，而更傾向肯定京都珂羅版技師小林忠治郎的工藝水準。需要指出的是，羅振玉對珂羅版的偏愛在當時中國古籍複製界絕非主流，當時更多出版者偏好成本較低的石印本。

1923年關東大地震發生後，日本各界普遍認識到保存古籍文物的緊迫性。同時，中日兩國大學教育體制逐漸完備，文史研究與圖書館學等學科發展亦日趨成熟。古籍的價值不再侷限於個人收藏與鑑賞，而被重新定位為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學界對古籍複製的標準也相應提升，不僅在視覺上追求圖版的高清細膩，亦強調保全批註、用紙、裝幀等文本之外的一切信息，還競相為自己選定的重要典籍撰寫具有學術價值的解題。由此，珂羅版影印原書、附加解題冊的複製模式逐漸確立，並為中日學界與收藏界普遍接受。然而，由於珂羅版製作成本高昂，其在中國的流通與接受度遠不及在日本，始終屬於小眾愛好。

工友社，1913），頁219。

⁸¹ 七條兼三：《將棋墨醉》（東京：西東書房，1991），頁427。

七條憲三與京都的小林忠治郎皆為寫真專業出身，擅長珂羅版製版、印刷。從憲三愛好收藏這點來看，他長年參與尊經閣叢刊、古典保存會、貴重古典籍刊行會的複製工作，主持貴重圖書複製會的相關業務，應與其對典籍之熱愛與鑒藏之志密切相關。正如七條愷複製大量書法資料，應也與其自身對書法深的心得不無關聯。七條憲三的複製書目深受山田孝雄等學者研究方向的影響，正如小林忠治郎的複製書目亦直接反映出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羅振玉等活躍於京都的中國學學者的研究動態及學術關懷。

此外，專賣法帖圖書的西東書房之所以能經歷百餘年而屹立不搖，固因七條愷、七條兼三善於經營且事業多元，也因習字的傳統在日本仍有相當的生命力。只要還有人練書法，西東書房的書法字典與字帖便不乏市場。而人們對書法類圖像精度的要求普遍不如對繪畫作品那般，因此這些字典、字帖仍可以走平價大眾路線。因數位印刷等新技術的迅速迭代，成本高昂且無法大量印刷的珂羅版則瀕臨消亡，益發小眾；近代以珂羅版複製的古籍，如今也成了收藏、研究的對象。至於近代中日兩國出版商兼印刷技師的生平信息及交遊網絡，仍有諸多待考之處，容俟他日續論。

附表

附表 1 七條愷印刷刊行資料目錄

書名	著者／編者	出版年	發行者、印刷者	印刷所	發行所	備註
<i>The psychology of childhood</i>	Frederick Tracy	1899	七条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西東書房	
都名所圖会		1901				
古籀篇	高田忠周	1902	吉川半七/七條愷	金属版合資会社	蘆野楠山	
<i>Fremdwörterbuch</i>		1904	七條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西東書房	
實用女子書翰文		1905				
二宮尊徳翁五十年紀念帳	岡田良平	1906	七条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西東書房	
戰時紀念事業と自治經營	内務省	1906				
戰時援護事業と慈惠施設	内務省	1906	七条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國勢調査要談	宮本基	1907				
梔花拾遺	小出祭	1908	小出林吉/七條愷		西東書房	
樂志帖：附譯文		1908	七條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西東書房	
改正刑法釋義（上、下）	田中正身	1908 1909	七條愷/白土幸力	三光堂	西東書房	
三洲居士集	長三洲	1909	七條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西東書房	
實用女手紙（上、下）	鳴門須藤求馬	1909-1910	七條愷	金属版印刷合資会社	西東書房	

女手紙	鳴門須藤 求馬	1910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漢字詳解（全六 卷）	高田忠周	1909~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廣唐賢三昧集		1910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說文二徐箋異	田吳炤	1910			西東書房	
高蔭春曙帖 改 版	岡山高蔭	1910 1911 再版 1913 改版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張廉卿蘭亭叙		1911	張孝移、七條 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張廉卿杜工部五 律		1911	張孝移、七條 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張廉卿行書帖		1911	張孝移、七條 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劉松無龍顏碑		1911	書道振興會、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金鈴遺響	佐佐木信 綱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小島成齋先生草 書千字文	小嶋知足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秋聲賦：家熙公 真蹟細楷	近衛家熙	1912			西東書房	
懷素千金帖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先哲書影	萩野由之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重修蘭亭記	文徵明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真跡岳陽樓記	文徵明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學書通言	楊守敬	1912	七條愷	凸版印刷株式 會社本所分工 場	法書會出 版部	
松花堂真蹟三十 六歌仙短冊帖	昭乘	1912			西東書房	
梧崗千字文	小山梧崗	1912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顏真卿楷書多寶 塔碑帖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張金界奴本蘭亭 叙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定武蘭亭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大字心經	日下部東 作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宋搨十七帖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明宋仲溫真艸合 璧帖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崧翁真迹奉獻帖	貫名芭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孫過庭艸書景福 殿賦帖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聖勅帖	高田忠周	1913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唐人真跡獨草經 卷		1914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中村不 折識
唐人真跡楷書經 卷		1914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中村不 折識
唐人真跡章草經 卷		1914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資會社	西東書房	中村不 折識
玉版洛神賦十三		1914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合	西東書房	中村不

行				資會社		折識
袖珍五體字類	法書會編輯部	191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小蘋畫譜第1、2輯	野口親	1917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畢山先生南畫教本		1918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寫真轉印書畫手本類專賣所 黑木欽堂跋
對山先生山水畫本	日根野長	1919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野口小蕙跋
顏魯公祭姪帖		1919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日高秩父題簽
顏魯公明遠帖		1919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趙文度山水冊子		1919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黑木欽堂跋
明拓智永千字文		1925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內藤湖南題簽， 羅振玉舊藏
訂正再版漢字詳解（全三卷）	高田忠周	1925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印刷所、發行所地址改為「東京市神田區花房町四番地」（秋葉原驛前）

明拓顏真卿多宝塔碑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學書通言疏釋	楊守敬著、樋口銅牛疏釋	1926	七條愷	圓谷印刷所（日本橋區龜島町壹丁目四拾貳番地）	西東書房	
唐人摹王方慶萬歲通天進帖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唐懷素草書千字文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唐僧懷素自敘帖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趙文敏公行書千文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明拓雁塔聖教序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宋搨十七帖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附釋文
秦蒙將軍之像碑	楊守敬撰並書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黎庶昌篆額
永壽靈壺齋藏原刻停雲館法帖全十冊附錄釋文一冊		1926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唐本裝訂，二帙 松田南溟釋文， 樋口銅牛句逗
催馬樂抄		1926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古典保存會事務所	卷末山田孝雄 解說，粘貼廣告 一紙，頒布負 責人七條憲三
五言詩四首：		1927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唐本裝

崧翁真蹟						訂
崧翁行草、杜律十七首		1927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唐本裝訂
白氏文集卷第三	白居易	1927	古典保存會 右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非賣品
色葉字類抄攷略	山田孝雄	1928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金澤稱名寺所藏弘決外典鈔，附成簀堂所藏實永對校本		1928	七條愷	七條寫真印刷所（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三番地）	西東書房	發賣所：民友社聽鶯莊藏版
漢字の起原と支那古代の文化	高田竹山	1928 年初版 1929 年第五版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每日叢書第六輯
學書三訣	中村不折編	1929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朝陽字鑑精萃	高田忠周	1929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昭和四年三月六日刪定，畢功於說文樓，樓之人忠周」
古文孝經		1930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一切經音義（共七冊）	玄應撰，山田孝雄編	1932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西東書房	
新撰字鏡 附新		1933	七條愷		西東書房	初版校

撰字鏡攷異並索引 改版						刊 兼 發 行 者 大 槻 文 彦
日用漢字正解	高田忠周	1934	七條愷	寫真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頓要集（瀧田英二藏）		1934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行成字鏡	早川友惠 編著	1935	法書會出版部 代表者七條愷		西東書房	
千字文詳解	西有慧觀	1936	七條愷	精興社 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十一番地	西東書房	
古典による祭政一致の本義	山田孝雄	1939	七條愷	精興社 神田區錦町三丁目十七番地	西東書房	
延喜式神名帳		1939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古典和歌集序	傳寂蓮筆	1940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增補五體字類	法書會出版部	1940 年改訂十三版	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戒律傳來記		1941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		1943	古典保存會 代表者：七條愷	金屬版印刷所		
行成字鏡	早川友惠	1951 年新版	七條兼三 台東區上野恩	一世印刷有限公司	西東書房	

			賜公園天神山	台東區車坂町 四四番地		
蘭亭墨寶：韓 珠船本		1952	發行者：七條 兼三	船澤コロタイ プ印刷所 杉並區西荻二 丁目一〇四番 地	西東書房	
松居遊見叟功德 記		1952	發行者：七條 兼三	三和紙業株式 會社 東區淺草壽町 一丁目九番地	西東書房	
學書三訣	中村不折 編	1955	發行者：七條 兼三（台東區 上野恩賜公園 天神山）	三和紙業株式 會社	西東書房	

附表3 七條憲三印刷刊行資料目錄

書名	著者／編者	出版年	發行者、印刷者	印刷所	發行所	備註
一遍上人繪		1919	發行者田中有美 印刷者七條憲三	金屬版印刷所	田中文庫	發賣所： 芸草堂本 店、分店
芳崖先生遺墨 全集 乾、坤	東京美術學 校編纂	1921	著作者兼發行 者：岡倉秋水 印刷者：七條憲 三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圖像為珂 羅版，文 字為金屬 活字
植松茂岳遺墨	植松安	1925	七條憲三	七條憲三	七條憲三	地址：芝 區西久保 廣町二十 三番地
校本萬葉集		1925	編輯兼發行者佐 佐木信綱 印刷者七條憲三	金屬版印刷所	校本萬葉 集刊行會	印刷所地 址：神田 區小柳町

						鐵道栢下一號
古簡集影 第1 ~5輯	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	1925	發行者：東京帝國大學	七條憲三	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	
新日本習字帖	岸井辰雄	1927	七條憲三	金屬版印刷所	西東書房	
古文書時代鑑 續編	東京帝國大學	1927	印刷者：七條憲三		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	
重廣會史		1927-28		七條憲三	公益法人育德財團代表者理事石黑文吉	尊經閣叢刊戊辰歲配本 非賣品
松風集（上下）	鍋島直大	1928				卷末有長方形朱紅鈐印「東京市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三番地/七條憲三謹製」
元曆萬葉集、 附卷	佐佐木信綱 編纂	1928-29	發行者鎌田敬四郎 印刷者七條憲三	七條印刷所	朝日新聞社	
龍龕手鏡 附 解說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1929	七條憲三			景金剛山榆岾寺藏本
世說新語、世 說敘錄		1929	發行者育德財團 印刷者七條憲三			尊經閣叢刊己巳歲配本

						非賣品
禮記正義		1930	發行者：東方文化學院，代表者荻野仲三郎	七條憲三		身延山久遠寺藏宋本殘卷
古簡集影 第6～10輯	東京帝國大學史料編纂所	1930	七條憲三		七條書房	
御成敗式目		1931	發行者育德財團 印刷者七條憲三			尊經閣叢刊辛未歲配本，非賣品
信濃國寶集	信濃教育會	1932	發行者：橋本福松 玻璃版印刷者：七條憲三（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六番地） 活版印刷者：白井赫太郎		古今書院	
古簡集影 第11～14輯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史料編纂所編	1932	七條憲三		七條書房	
古文書選 第2輯	古文書研究會編，代表者花見朔己	1932		七條憲三	七條書房	
寢覺		1933	發行者育德財團 印刷者七條憲三		尊經閣叢刊癸酉歲配本，非賣品	
五千卷堂集	岐山木蘇牧著，石野徹註	1935	發行者小倉正恆 印刷者七條憲三			

元永本古今和歌集抄		1936	七條憲三	七條書房		三井家藏 (今藏東京國立博物館)
古今和歌集綜覽	久曾神昇	1937	七條憲三	春山治部左衛門 神田區神保町三丁目十番地	七條書房 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六番地	
類聚名義抄 (十卷)		1937	七條憲三		貴重圖書複製會 (東京市芝區西久保廣町二十六番地)	
妙法蓮華經法師品 第十		1939	七條憲三		七條書房	
溫故知新書	大伴廣公	1939	發行者侯爵前田 家育德財團 印刷者七條憲三			尊經閣叢刊己卯歲配本，非賣品
こけ衣(四卷)		1939	同上			尊經閣叢刊己卯歲配本，非賣品
一品經和歌懷紙		1939	貴重圖書複製會 代表者七條憲三	七條印刷所		附解說，佐佐木信綱識
柳下集			發行者永山近彰 印刷者七條憲三			
元曆萬葉抄	羽田春堃編	1940	七條憲三		七條書房	
北野本日本書		1940-41	貴重圖書複製會	七條印刷所	貴重圖書	

紀			代表者七條憲三		複製會	
沖虛至德真經		1949	發行者前田育德會，代表者今井吉之助 印刷者七條憲三			尊經閣叢刊第六十四回配本 非賣品
金剛童子法		1951	同上			尊經閣叢刊第六十五回配本 非賣品
久能寺經	名筆鑒賞會編	1951	發行者名筆鑒賞會代表細川護立 印刷者山之內印刷株式會社代表著高橋誠司 圖版印刷者七條憲三			非賣品
東松本大鏡第一～三		1953、56、59	編輯兼發行者貴重古典籍刊行會 代表者：酒井宇吉 コロタイプ印刷者：七條憲三 活版印刷者：共立社印刷所 春山治部左衛門		貴重古典籍刊行會一誠堂店內	
古本說話集		1955	編輯兼發行者貴重古典籍刊行會 代表者：酒井宇吉 コロタイプ印刷		貴重古典籍刊行會一誠堂店內	

			者：七條憲三 活版印刷者： 共立社印刷所 春山治部左衛門			
將門記		1955	同上		同上	楊守敬、 七條憲三 舊藏
田中家所藏住 吉如慶具慶模 年中行事繪卷 模本		1955	印刷者：七條憲 三			
短冊凌寒帖	佐佐木信綱 編	1957	印刷者：七條憲 三		竹柏會	
草案集		1958	編輯兼發行者 貴重古典籍刊行 會 代表者：酒井宇 吉 コロタイプ印刷 者：七條憲三 活版印刷者： 共立社印刷所 春山治部左衛門		貴重古典 籍刊行會	
佚名唐詩集殘 卷，白氏長慶 集卷第 22		1958	同上			
大唐三藏玄奘 法師表啓：知 恩院藏		1960	同上			

附表 4 尊經閣叢刊書目

書名	版本信息	發行年月	印刷者	備註
古語拾遺	亮順本，稱名寺舊藏	1926.6		
色葉字類抄		1926.6	大塚稔	
大安寺伽藍緣起并流記資財帳		1926.6		
枕草子（附異本枕草子）	前田本	1927.12	大塚稔	
重廣會史	宋版	1928.1	七條憲三	線裝
土佐日記		1928.7	倉田實	
古今和歌集	清輔本	1928.12	大塚稔	蝴蝶裝
桂川地藏記（上下）		1929.7	審美書院	線裝
世說新語	宋版，金澤文庫舊藏	1929.10	七條憲三	線裝
寶積經要品		1929.10	大塚稔	卷軸
祭禮繪草紙	傳土佐光重筆	1929.10		卷軸
山水並野形圖	仁和寺舊藏	1930.4	審美書院	卷軸
兼好自選家集	草稿本	1930.5	大塚稔	包背裝
拙稿千百	高麗版	1930.9	七條憲三	線裝
新古今和歌集	傳二條為親筆	1930.12	大塚稔	蝴蝶裝
年中行事秘抄	中原師世本系	1931.5	審美書院	卷軸
貞永式目	鶴岡本	1931.8		線裝
日本國現報善惡靈異記（卷下）	仁和寺舊藏	1931.11	審美書院	包背裝
仁和寺御室御物實錄		1932.4	大塚稔	卷軸
老子億	明版	1932.5	神田才一么社	線裝
十五番歌合	藤原伊房筆	1932.12		卷軸
順渠先生文錄	明版	1932.12	七條憲三	線裝
類聚國史		1932-34		卷軸
天狗草紙	園城寺卷	1933		卷軸
廣田社歌合	藤原俊成筆	1933.7	大塚巧藝社	卷軸

寢覺		1933.8	七條憲三	線裝
中外抄（下卷）		1934		卷軸
一本種、自論記、徒然百首		1934.4		線裝
兩京新記（卷第三）	金澤文庫舊藏	1934.11		
惠慶集	藤原定家等筆	1935.3	大塚稔	蝴蝶裝
赤穂義人錄	草稿本	1935.4	七條憲三	線裝
三寶繪		1935.7	審美書院	
道濟集		1935.10	倉田實	粘葉裝
舊鈔本古文孝經	甘露寺親長筆	1935.12		線裝
豐明繪草子		1936.1		卷軸
楠木合戰注文，附博多日記		1936.4		卷軸
後撰集、拾遺集	淨辨本	1936.8		蝴蝶裝
古周易經解略	奥村尚寬編撰	1936.11	七條憲三	線裝，丙子歲配本
大和物語		1936.12	倉田實	蝴蝶裝
冥報記	長治二年鈔本	1937.4	大塚稔	粘葉冊子
二中歷		1937.6		粘葉裝
節用集	相国寺横川和尚筆	1937.10	七條憲三	大和綴（日式線裝）
法性寺殿御集		1937.10	倉田實	粘葉裝
豐太閤三國處置太早計		1937.11		
古事記		1938.1		線裝
遍照發揮性靈集		1938.2	大塚稔	
春草堂集		1938.5	七條憲三	線裝
江談抄		1938.8		卷軸
方丈記		1938.8	倉田實	
こけ衣		1939.2	七條憲三	蝴蝶裝
入木秘書		1939.2	倉田實	線裝
溫故知新書		1939.10	七條憲三	線裝，己卯歲配

				本
中務集		1939.11	倉田實	
今鏡		1939.12	大塚稔	蝴蝶裝，己卯歲 配本
閒居友		1940.4	大塚稔	蝴蝶裝
南都巡禮記		1940.9	審美書院	線裝
平家物語	真字熱田本	1941.1	大塚稔	線裝
齋宮女御集		1942.1	倉田實	
四條中納言集		1942.10	大塚稔	蝴蝶裝
元輔集		1942.12	倉田實	
入道右大臣集		1943.10	倉田實	蝴蝶裝，癸未歲 配本
玉燭寶典		1943.10		卷軸
管家傳		1944.6		卷軸
沖虛至德真經（列子）	宋版，金澤文庫舊 藏	1949.10	七條憲三	線裝，第 64 回配 本
金剛童子法		1951.8	七條憲三	卷軸，第 65 回配 本
荏柄天神緣起		1951 （1935 年 完成）	大塚稔，川面義 雄木版	卷軸，第 62 回配 本
建治三年記	金澤文庫舊藏	1952.7	審美書院	卷軸，第 66 回配 本

附圖

附圖 1

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

神田區仲町一丁目三番地

設立 明治卅年六月 營業滿期 全四十年六月

營業目的 金屬製版印刷

資本金 10,000. 資本主人員 6.

業務擔當社員 七 條 愷

社員氏名及出資額

3,580. 田中 宗兵衛	3,120. 中井 菊次郎	2,000 七 條 愷
700. 鈴木 元	300. 鈴木 謙	300. 牧野 謙次郎

附圖 2

The Institutes of Roman Law by A. James O'Connell, Esq. B.C.L. M. A. 七條愷

附圖 3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八日發行
明治三十二年六月十五日複寫印刷

東京市下谷區上野公園内字東園

發行所 林 平次郎 電話本局五百三十一番
東京市日本橋區通三丁目六番地 電話本局七百〇八番

印刷所 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
東京市神田區仲町壹丁目三番地 電話本局千八百八十六番

印刷者 七 條 愷

附圖 1 (左)：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信息，引自東京興信所《銀行會社要錄 附役員錄》第二版

附圖 2 (中)：七條愷申請複製西文書籍，引自大藏省印刷局編《官報》1899 年 12 月 13 日

附圖 3 (右)：七條愷複製 Rudolf Sohm 的 *The Institutes of Roman Law*

附圖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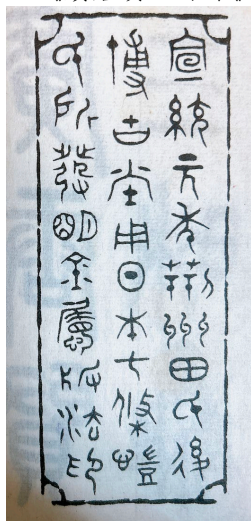
明治三十五年五月一日印刷
明治三十五年五月八日發行

著者	高田忠周
發行者	吉川半七
印刷者	七條愷
印刷所	金屬版印刷合資會社
發賣者	蘆野楠山

附圖 4：高田忠周編：《古籀篇首卷》（吉川半七發行，1902 年）版權頁，七條愷的金屬版

合資會社下鈴「精擘」印。

附圖 5：《廣唐賢三昧集》刊記



附圖 6：《廣唐賢三昧集》版權頁

明治四十三年二月廿八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發行

廣唐賢三昧集共十册
定價金八圓

編輯發行 東京市神田區佐久間町二丁目一番地
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佐久間町二丁目一番地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佐久間町二丁目一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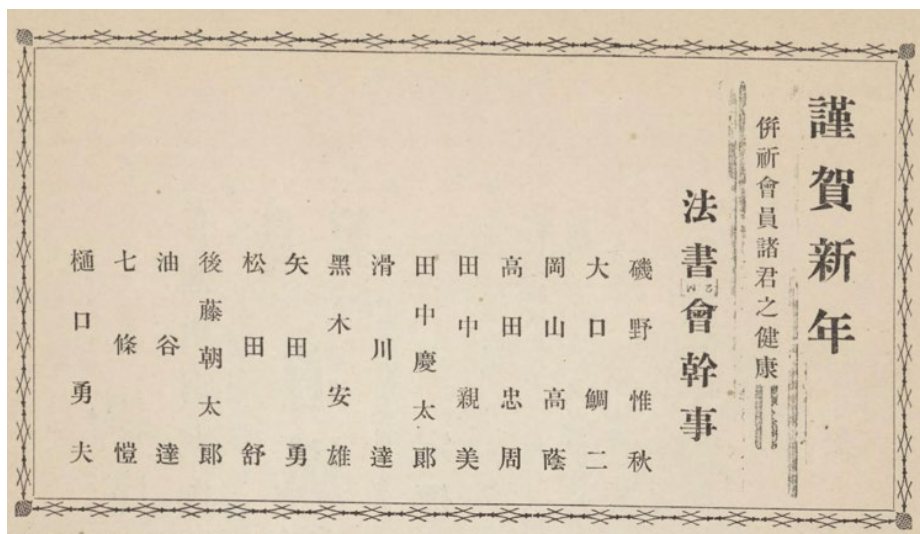
所 賣 東京市本郷區海島四丁目八番地
北京門外琉璃廠中開路北
上海大東門內北
京城木町二丁目
日校德文文
韓經古友求
書山齊碑堂
房舖功書書房

不復
許製

七條 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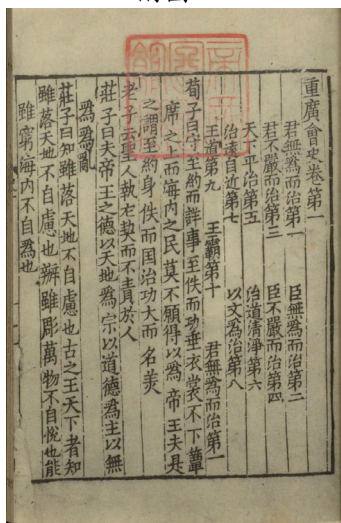
電話貯金口番東京七三七番
電話下谷七〇六番

附圖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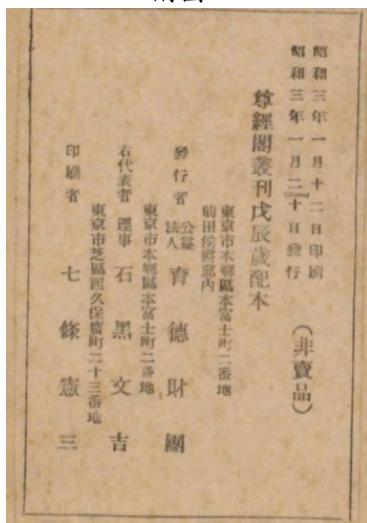


附圖 7：法書會幹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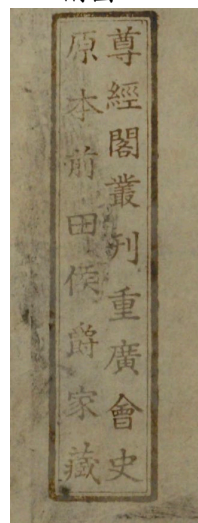
附圖 8



附圖 9



附圖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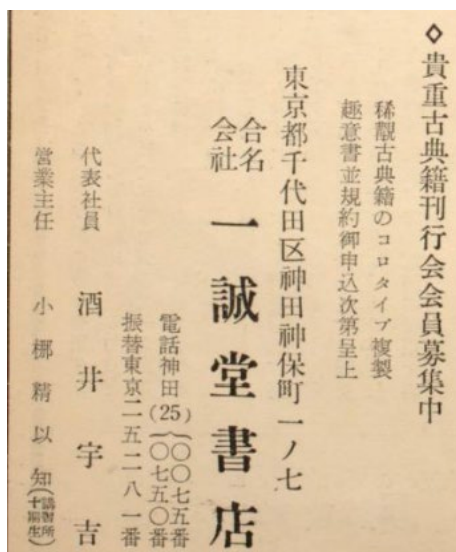


附圖 8：尊經閣叢刊《重廣會史》卷一

附圖 9：尊經閣叢刊《重廣會史》版權頁

附圖 10：尊經閣叢刊《重廣會史》卷末鈐印

附圖 11



附圖 11：一誠堂書店貴重古典籍刊行會會員募集廣告，引自《圖書館職員養成所同窓會三十年紀念誌》，1953 年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唐〕玄應撰，〔日〕山田孝雄編：《一切經音義》，東京：西東書房，1932 年。
- 〔清〕《同瀛錄（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調查）》，東京並木活版所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1902）印行。
- 〔清〕王士禎撰、〔清〕宗室文昭補錄：《廣唐賢三昧集》，東京：西東書房，1910 年影印。

二、近人論著

- 〔日〕《九條家本延喜式神名帳》，京都：官幣大社稻荷神社，1925 年，附解題冊。
- 〔日〕七條兼三：《將棋墨醉》，東京：西東書房，1991 年。
- 〔日〕山田孝雄編：《一切經音義索引》，東京：西東書房，1925 年。
- 〔日〕大槻文彦：〈跋〉，昌住：《新撰字鏡》卷十二末，東京：六合館，1916 年。
- 〔日〕大槻如電編：《新撰洋學年表》，東京：大槻茂雄發行，1927 年。
- 〔日〕小宮豐隆、麻生磯次、能勢朝次監修：《芭蕉講座》，第 3 卷（傳記篇），東京：東京創元社，1955 年。
- 〔日〕小森正明：〈宮内省・宮内庁における古典籍複製事業の沿革とその意義〉，《書陵部紀要》第 65 号（2014 年），頁 64-75。
- 〔日〕大野晉：〈解説〉，《橋本進吉博士著作集》第 3 冊《文字及び仮名遣の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9 年。
- 〔日〕川島五三郎、八木敏夫編：《三訂版 全集叢書總覽：明治初年-昭和三十年》，東京：八木書店，1952 年。
- 〔日〕水野鍊太郎：〈歐洲ニ於ケル著作権法ノ沿革及其國際的關係ノ由來〉，《法律學經濟學内外論叢》第一卷第五號，東京：寶文館，1902 年，頁 1-24。
- 〔日〕石田肇：〈『古逸叢書』をめぐって—木村嘉平、そして『史略』—〉，《書論》（三重：書論研究會，1989），頁 172-190。
- 〔日〕《出版法版權法条例 附出版及版權願届書式》，東京：敬業社，1893 年。
- 〔日〕出版タイムス社編：《日本出版大観》，東京、大阪：出版タイムス社，1930 年。
- 〔日〕玉林晴朗：〈上野四方山話〉，《武藏野》第 26 卷第 11 號，1936 年，頁 19-25。
- ：《秋色と秋色桜》，東京：西東書房，1941 年。
- 〔日〕住友友成編：《泉屋清賞 刪訂》，1934 年

- 〔日〕佐藤進：〈董康日記に見る小林忠治郎〉，《二松》卷 23，二松学舎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編，2009 年，頁 239-260。
- ：〈珂羅版之路的開拓者小林忠治郎——以羅振玉、董康、傅增湘的交流為中心〉，王勇主編：《書籍之路與文化交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 年，頁 18-43。
- 〔日〕東京興信所編：《銀行會社要錄 附役員錄》第二版，1898 年。
- 〔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明治 22-44 年）》，東京高等工業學校，1910 年。
- 〔日〕〈前田育德會と尊經閣叢刊との關係に就て〉，《建治三年丁丑記》卷末折頁，東京：前田育德會，1952 年。
- 〔日〕研谷紀夫：〈明治後期における博文堂の写真出版事業：写真師小川一眞との関わりを中心として〉，日本映像學會《映像學》第 108 號，2022 年，頁 78-100。
- 〔日〕高田忠周編：《古籀篇》，蘆野楠山發行，1902 年。
- 〔日〕脇本十九郎：〈永祿二年古寫本 君臺觀左右帳記〉，《美術研究》第 20 號，東京：帝國美術院附屬美術研究所，1933 年 8 月，頁 28-40。
- 〔日〕酒井宇吉編：《一誠堂古書目錄：創業五十周年紀念》，東京：一誠堂書店，1955 年。
- 〔日〕菅野智明：〈博文堂における中国法書の影印出版について〉，《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第 16 號，2015 年 3 月，頁 14-52。
- 〔日〕森鷗外：《鷗外全集》著作篇第 21 卷，東京：岩波書店，1938 年。
- 〔日〕尊經閣文庫整理：〈尊經閣叢刊略解題〉，《文獻》第 5 號，東京：特殊文庫連合協議會，1961 年，頁 35-44。
- 〔日〕橫山重編：《竹林抄古註》，貴重古典籍叢刊 2，東京：角川書店，1969 年。
- 〔日〕濱田耕作等編：《泉屋清賞 續編 彝器部 佛象附》，1916 年。
- 王慶祥、蕭文立校註，羅繼祖審定：《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 年。
- 王壯弘：《崇善樓筆記》，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8 年。
- 王貴忱、王大文編：《可居室藏書翰·羅振玉》，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馬輝、于立文編著：《中國書法家大辭典》第二卷，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11 年。
- 容 庚：《漢金文錄》，北京：中華書局，2012 年。
- 廉 泉：《南湖東遊草》，北京：朝華出版社，2018 年影印本，收入「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 梁啟超：《雙濤閣日記》，《飲冰室專集》之二十九，《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 陳 郁：《拾金不昧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

- 國家圖書館編：《國家圖書館藏青銅器全形拓集成》，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19年。
- 張召奎：《中國出版史概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 張鴻鳴：〈維新以傳古——羅振玉與近代印刷技術〉，《印刷文化》2023年第1期。
-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 楊月英：〈董康與日本珂羅版技術專家小林忠治郎的交遊——兼補董康珂羅版印本書目〉，《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26輯（2022年12月），頁349-363。
- 楊麗瑩：《掃葉山房史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劉宇珍：〈照相複製年代裡的中國美術：《神州國光集》的複製態度與文化表述〉，《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5期，2013年。
- 繆荃孫：《繆荃孫全集·詩文》第2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
- 瞿艷丹：〈影印存真：中國近代的珂羅版印刷技術考〉，《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 ：〈影印《大清歷朝實錄》史事雜考〉，《中國出版史研究》2022年第4期。
- 羅繼祖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錄》，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年。
- 蘇枕書：《歲華一枝：京都讀書散記》，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

三、報刊資料

《內閣官報》

〔日〕《朝日新聞》

〔日〕《讀賣新聞》

〔日〕法書會編：《書苑》

四、網路資料

孔夫子舊書網公開《悉曇字記》（1917年）影印本書影：

<https://book.kongfz.com/214741/5750219813>

「印刷の原点を探る：石版印刷の再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wKoYq0vL0>

西東書房主頁：<https://seitoshobo.jp/gotaijirui>

京都便利堂所攝珂羅版解說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6fMMSaesRg&t=107s>

株式會社斐求堂書店公開《悉曇字記》（1917年）影印本書影：

https://www.kosho.or.jp/products/detail.php?product_id=401077893

「漢籍集覽」公開大治三年寫本《一切經音義》全文書影：

https://db2.sido.keio.ac.jp/kanseki/bib_detail?bibid=043740

Publishers and Printing Technologie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Classical Texts in Modern Japan: A Case Study of the Shichijō Gai Family

QU Yandan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enterprise of the Shichijō Gai (七條愷) family in Tokyo, examining the evolution of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for classical texts from the Meiji period through the immediate postwar years. It outlines the primary methods employ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for various types of publications, and analyzes how successive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nd publishers made strategic choices regarding reproduction techniques and target texts.

Following the 1923 Great Kantō Earthquak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preserving classical texts grew in Japan. Meanwhile, bibliographical and library sciences in China and Japan advanced, demanding higher standards for reproductions, not only in visual clarity but also in marginalia, paper quality, and binding. Scholars produced commentaries for selected texts, and publishers' catalogs reflected contemporary academic interests. A hybrid model combining collotype facsimiles with interpretive volumes gradually emerged and gained broad acceptance in scholarly and collecting circles.

Keywords: Photo-meta lithography, Collotype, Luo Zhenyu, Classical texts, Reproduction

* Adjunct Lecturer at Kindai University

